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薛国安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蒯建华 陈京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刘步健

副主任 魏晓蕾 陈锋 朱杰 钱照亮

陈童

编委 (按笔画为序)

任世红 李业 吴元庆 张吉林

张美云 张思东 陈思 傅佩丽

主编 陈锋

副主编 陈思

目 录

2022年 第5期 总第139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宋 好
责任编辑:鲍跃华 吉 强 王天海 蒋建忠

本期特稿

-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重在落实 / 王炳权 4
- 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不变质、色、味的思想逻辑 / 齐卫平 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基于湖北省秭归县的案例考察 / 方 帅 20
- 省域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基于东部发达省市的分析 / 王树华 孟 静 查婷俊 26

统战理论与实践

-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属性论析 / 骆 平 张成明 33
- 论多党合作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 / 张金鹏 40
- 中国特色新型统战智库创新策略研究 / 吕 戎 李 刚 45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 年 10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民营经济

- 张謇精神的时代价值与传承路径探析——民营企业对张謇精神的认知与践行 / 徐春辉 岳文典 52
- 身份约束、动机驱动或寻求资本:企业家缘何政治参与 / 秦臬童 王永香 任思琪 吴高鹏 59

学习与思考

- 不同研发类型组态效应对高校科技创新绩效影响
——基于 31 个省份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葛媛媛 71
- 发挥红色影视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路径探析 / 褚圆亮 郭玲霞 78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2 - 05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重在落实

王炳权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逻辑自洽、内涵丰富,在民主价值上强调了民主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民主理论上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四个要看、更要看”“八个能否”标准;在民主实践上要求贯彻“三个具体地、现实地体现”,不断健全民主“五环节”,聚焦解决具体现实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是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需要,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要求。当前,党的领导不断加强、民主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法治建设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调整不断优化、权力制约机制不断完善,这为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现实基础。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政治建设;民主价值;民主治理;民主实践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5-00004-10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落到实处。围绕这一主题,本文将从四个部分展开。首先,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全过程人民民主论述的文本分析发现,其重点是“落实”。其次,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民主的发展和建设,本文对此进一步具体分析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急不得、也是等不得的大事,即探索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何必要而且重要。再次,新时代的民主政治建设正在进行中,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已付诸实践,有必要深入分

析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基础,思考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资源。最后,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具体地、现实地体现”的要求,分析如何更好落实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本文总思路是,通过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人民民主直接论述和相关论述,讨论如何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推进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抓手和切入点。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

有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宣传和阐释正如火如荼进行。回望一段时间以来的研究,我们

收稿日期:2022-09-30

作者简介:王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副主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21&ZD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有必要从各自的路径依赖中跳出来，再次审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成果，或可发现一些研究偏误、认识教条，或可修正研究方向，重新发掘新的知识增长点。从这一角度出发，回到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的文本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工作。

（一）主要文本解析：经验总结、理论阐释、工作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直接论述虽不多，但逻辑清晰、论断鲜明，既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有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和工作部署要求，环环相扣，结构非常完整。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时，基于立法实践各个环节上的民主实践提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1]这是第一次把全过程和人民民主联系起来。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这是对在古北市民中心基层立法点考察时提出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论断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此时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未作出清晰界定和系统分析。

2021年10月13日，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历史回顾和实践观察双重透视的结果，即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识拉长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年，扩展到整个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他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

与实践。”^[3]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这一段论述是全部论述的核心，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这些论述表明人民有实质性的当家作主的实践和制度渠道。

基于充分的民主实践和绩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重大论断：一是“民主是人类共同价值”；二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4]。这两个论断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作出的进一步理论阐释，解释了民主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一般性层面上，民主是人类共同价值，它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在特殊性层面上，全过程人民民主集中表现在它是真民主，因为它能够做到“三全”，进而实现“四统一”，充分彰显中国民主的“三个最”。这样的阐释链条，言简意赅地把握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特质。尽管篇幅较短，但意蕴深刻。例如，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这两个统一，就是全新的判断。应该说，这两个论断把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理论与实践创新，阐释得极为清晰。

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5]“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6]

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的要求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总要求，即“三个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二是要取得实效，即不断扩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五个方面。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对如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是清晰的，边界是明确的，问题讲的是清楚的。

（二）重大理念提出：标志着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思想形成逻辑闭环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思想形成了逻辑的闭环，说明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实现了理论自洽和完善成熟。

1. 规律性总结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文本中可以看出，相关论述有一个不断深化、不断抽象的过程。在考察上海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时，他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从这一论述顺序中

可以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既是相关论述的升华，更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性总结。

这一规律性的总结，以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为支撑，不是横空出世的全新的东西。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三个逻辑，学界已推出若干研究成果。但是，学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和宣传，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误会、误区，即把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割裂开来，不在一脉相承的基础上来谈创新，而是脱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不必要的拔高，结果导致某种程度上学界作出的理论阐释，在读者或是听众那里变成了一个难以触及的空中楼阁。研究者需要在实事求是这一方面下功夫，回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述上来。这一理念的提出是对既往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并非没有根基的概念演绎。这一概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对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规律性的概括和提升。

2. 理论上跃升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是对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承上启下和综合创新，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在新时代的逻辑闭环。它的逻辑完整性体现在：第一，有明确的价值表达；第二，有推陈出新的理论阐释；第三，有清晰的实践要求。

在价值表达方面，强调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强调民主是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时，也重视自己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集中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此前，我们虽然承认民主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更强调中国民主的特殊性，没有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明确指出民主是人类共同价值。事实上，在民主一般性问题上，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回避的。而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追溯为：怕堕入普世价值陷阱，怕与世界民主进程割裂，所以

导致在民主理论阐释上，我们采取了相对保守和被动的形式。

在理论阐释方面，除了上述谈到的“三全”“四统一”等，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还有很多，例如，他提到“四个要看、更要看”“八个能否”等。“四个要看、更要看”是检验人民民主真实性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7]这不但重申了真实性是衡量民主的基本标准，而且清楚地指明了如何判断民主真实性的基本条件。

“八个能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和有效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8]

这些重要的理论阐释既讲清了中西民主的本质区别，又为我国民主政治实践提供了可靠标准，彰显了我国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优越性。目前，我们在研究、宣传、阐释过程中，往往只讲总书记的“四个要看、更要看”，而忽视了“八个能否”。实际上，在“四个要看、更要看”之外，“八个能否”也是对政治实践的一个检验标准，这一点可能更为重要。

在实践话语方面，对如何推进民主实践，习

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有明确的要求和安排。要求体现在，“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9]。具体安排体现在，要聚焦解决具体的问题，要把解决人民美好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各个维度，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个阶段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纳入民主的实践过程，给予全面的谋划、精准的施策，让人民真正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到人民民主之于人民利益、社会进步以及国家发展的全方位保驾护航的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实现了价值表达、理论阐释、实践话语三方面的比较完满的统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这就是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的顶层设计，为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所谓逻辑闭环，它意味着理论的彻底性，应该说，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党对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形成了严密的逻辑。

从学界目前取得的成果来看，我们的研究更多聚焦于价值和理论这两个层面的阐释上，在实践层面的考虑稍显不充分、不到位，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阐释的工作应让位于实践性问题的思考，我们需要集中讨论全过程人民民主可操作性的途径，思考如何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真正落地，使理论的阐释和实践的成果能够相互印证。

总的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实现了价值表达、理论阐释、实践话语的逻辑闭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理论与实践规律的高度总结和理论认知上的跃升。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在落实

(一)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的要求

从以上对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全过程人民民主论述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其论述的核心范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鲜明的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可以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总要求和总任务。

此外,新近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第十部分的标题是“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此部分具体涉及的人大、政协、民族、宗教、人权等方面内容是 2021 年 8 月到 2022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10]。这个结构安排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中的有关政治建设部分的内容是相契合的,进一步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落在实处的要求。

(二) “两个大局”的要求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立足“两个大局”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1]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角度看,张树华教授对中国之治和世界之乱的分析有借鉴意义^{[12][13]}。我们要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之治的根本标志。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角度看,佟德志教授提出的整体性发展观和复合发展论有启发性^{[14][15][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发展顶层设计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建设。在新时代,“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已经提供了我们从实践中得来的一系列理论认知,我们已走向了顶层设计的时代。现在是要把这些理论认知整体性贯彻下去以及探索具体贯彻方式的时代。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全过程人民民

主重大理念顺时而生,这就是对民主政治建设在两个百年交汇期的顶层设计。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要求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在实践,重在落实,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要求。我们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愿景之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已经开启。现在距离第二个百年为时不多,时间紧迫,重任在肩,民主政治建设时不我待。

第二个百年的宏伟目标强调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从具体的任务区隔来看,民主政治建设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从整体的百年奋斗目标来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每一项目标的达成都是政治发展的任务。换言之,第二个百年目标,从根本上讲就是总体性的政治建设的任务。所以说,为实现百年目标,我们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其中包括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从逻辑上讲民主政治建设要对其他目标的实现具有带动作用。因此,从这一角度可以理解为何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恰恰展示了在这样一个整体性的发展思路中,民主政治建设的地位举足轻重。整体性的发展目标,也是一个政治发展的大目标,无论从子集还是从合集来看,政治建设都是极为突出的、关键的任务。

2. 满足人们对美好政治生活的向往的要求

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桑玉成教授认为解决基本矛盾的重要方面就是实现人们对美好政治生活的向往,美好政治生活意味着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取得高绩效^[17]。党的十九大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重要论断,提出了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人民的需求已经从“物质文化需求”提升到了“美好生活需求”。而这种“美好生活”不仅仅是在原有生活基础上的量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内涵上的拓展。正如党

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8]因此，对于“美好生活”是“美好生活”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是符合党的文件精神要求的。再者，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生活在一个有着良好政治秩序、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中是人民群众朴素的向往。

从目前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重要变化在于，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相较于物质环境可能更为重要。过去我们更加重视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这可以从中央的精神和领导人对人民获得感和满意度的强调中看出。毫无疑问，我们确实取得了长足进步，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但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心理的焦虑指数在不断上升时，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需求可能更加迫切，相关敏感度可能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尽快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表达和反馈。

3. 建设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要求

为什么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落实，是建设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全国人民形成的政治共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该论断的真理性在于：能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前途命运的问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向前推进，用扎实的实际行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成就，包括扎扎实实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来回应世界的观望、质疑乃至攻击，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需要我们把更多的精

力放在拼民主实践的硬仗上，而不能仅仅以打嘴仗来代替打硬仗。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我们没有打硬仗、没有推进民主实践，而是强调现阶段我们需要更加聚焦民主建设、民主实际，提升民主实效。

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不仅要靠推动经济发展和创造社会财富，更为重要的在于能不能开辟出一个基于社会主义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只有建设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我们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价值之争中，形成我们的话语权，从而提升我们的软实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有在价值目标、理论优势、实践绩效上真正获得比较优势，实现了中国之治，人民政党、人民政权、人民政府、良法善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构成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切实落到实处，才是真正把对西式民主的比较优势落到实处。

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充分说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符合历史和实践的逻辑。佟德志教授认为，民主与治理具有高度相关性，民主程度高的国家，治理效能一般也会比较高^[19]。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办成了很多以前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难事，取得了很好的治理绩效，与民主建设的成果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绩效的取得，没有广大人民的参与，没有广大人民积极性的调动，是无法实现的。总体而言，我们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条件包括以下方面。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取得新进展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核心，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

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标志着我们在党的领导方面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不断增强。具体表现为：一是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通过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加强巡视、建立和完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制度、落实意识形态工作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二是系统构建和有效运行党全面领导的政治经济文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制度建设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三是把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基础上，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能够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同步推进，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管理社会。

（二）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取得新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现实，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充分发挥我国政治制度对发展人民民主的优越性，有效保障广大人民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有序政治参与，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扩大和保障。这表明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已在进行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已是进行时。例如，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通过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加强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完善人大工作机制等措施，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方面，出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通过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等措施，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此外，党适应互联网时代的需要，走好网络群众路线，通过不断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第一时间掌握国家动态，并借助互联网平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新进展

民主和法治是统一的，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离不开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大力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主要表现为：一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二是国家各项工作依法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取得重要进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三是厉行法治，维护法律尊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党推进依法治国确保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是有效的管用的民主。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上取得新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全面推进实现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建

立起了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大力推进三个转变：一是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二是推动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转变；三是推动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五）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取得新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制度上对权力的运行作了进一步规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论断得到卓有成效的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是打造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二是推动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三是进一步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

这五个主要方面深入回答了如何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党和人民、党和法治“两大关系”做实的问题。这两大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标志，是中国民主政治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标识物。如果能切实做到这两点，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力就是旺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第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在中国，“程序正义”不能吸纳不满，人民要的是最高限度的保护，或者说是实质正义，但这种保护不是人民等靠要而是共同参与。西方的“选票吸纳不满”在我们这里行不通。“程序正义”无法解决党和人民的关系，也就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问题。“程序”在民主实践中从来都是不缺位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把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他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

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0]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鲜明地把党和人民的关系讲清楚了。如何落实是第一位的事情。第二，党要坚持依规治党、依法治国，保障并维护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民主与法治须臾不可分离，离开了民主谈法治或者离开了法治谈民主，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清醒认识到，依法治国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中，必须实质性推进依法治国方略。

四、“三个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中，对于“三个具体地、现实地体现”相关论述的研究较少。实际上，“三个具体地、现实地体现”这一表述极为重要，它构成了发展和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重要抓手。

（一）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

在党治国理政的战略谋划、设计安排与实际工作中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一方面，在治国理政理念上进一步彰显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普遍地惠及全体人民，坚定不移地推进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在治国理政评价上要彰显以人民为中心，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所有环节、各个领域、全部内容的评价上依靠人民、由人民来评判，使人民成为治国理政各项活动的最高裁决者。

（二）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民主化程度及其运作状况，直接关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和实际效果，关系到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巩固和各项权利的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败及其伟大历史使命的完成，因此，必须重视在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中加强民主建设。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要不断加强

党和国家机关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按照党章和国家法律的规定，不断健全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集体领导制度、民主决策制度等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要持续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是民主的基础、底线和保障，党和国家机关率先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过程人民民主才更有底气；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才更加可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才更获信任。

（三）把人民民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21]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更好增进人民福祉，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当前，我们已经迈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断丰富，对高质量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等方面的高品质要求不断丰富，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上充分解决好这些问题。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把事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各类民生工作放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任务中，提出更多惠民举措，更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全方位需求。

从习近平总书记对“三个具体地、现实地体现”的强调来看，上述三条应该是同等重要的。第一条讲制度体系的人民性，有了人民性就有了制度优势，民主实践的要点是做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建设，切实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落到实处，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众人商量得到各层级的落实。第二条讲善治，民主实践的要点是决策的民主化问题，让决策有共识。第三条讲民生导

向，民主实践的要点是广泛的政治参与问题。张明军教授特别强调民生政治参与，认为中国基层民众最关心的仍然是民生资源的分配问题，民众具有参与的动力。在民生政治参与过程中，培育了基层民众参与的规则意识和公平理念。当基层民众的规则意识、公平理念形成后，可以由民生政治参与向选举政治参与转变^[22]。

五、结语

综上，本文认为尚有四点认识值得注意。首先，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键一环，二者不是对立关系。民主治理和国家治理是统一的。其次，有关观念是革命性的，但其真理性需要实践验证，民主实证越发重要。换言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闭环要以实践来支撑。再次，民主的实践问题需要化约为具体问题。从民主的具体实践观之，目前民主的顶层设计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层面来讲，推动力都稍显不足，或者说落实不到位。最后，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落到实处，不能空转，专业的研究者应该有所推动，多提些思路和对策建议，少些不实事求是的拔高和空泛的议论，这可能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EB/OL]. (2019-11-03). http://www.gov.cn/xinwen/2019-11/03/content_5448083.htm.
- [2][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7-02(2).
- [3][4][6]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N]. 人民日报, 2021-10-15(1).
- [7][8][10][2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59、258、243—278、53.
- [9][1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75、645.
- [12] 张树华. 西式民主迷思与中国之治坦途 [J]. 当代世界,

- 2021(12): 46-51.
- [13] 张树华.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深刻理解40年来世界之变的政治脉络[J]. 经济导刊, 2021(12): 56-60.
- [14] 佟德志. 中国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与合力效应[J]. 政治学研究, 2016(5): 21-27.
- [15] 佟德志. 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复合结构与战略选择[J]. 政治学研究, 2022(1): 21-28.
- [16] 佟德志. 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力效应[J]. 探索与争鸣, 2022(4): 16-18.
- [17] 桑玉成.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基础性问题[J]. 探索与争鸣, 2022(4): 6.
- [1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8.
- [19] 佟德志. 治理吸纳民主——当代世界民主治理的困境、逻辑与趋势[J]. 政治学研究, 2019(2): 47-48.
- [21] 习近平. 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J]. 求是, 2019(10): 13.
- [22] 张明军, 朱玉梅. 民生政治参与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J]. 理论探讨, 2018(5): 38-45.

责任编辑: 王天海

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不变质、色、味的思想逻辑

齐卫平

摘要: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发展结出的重要理论成果,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逻辑。党确保“三个不变”,把中国共产党性质、成色、特征相统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实践鲜活经验的创新提炼。党确保“三个不变”,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基因工程,体现保证党的组织基因代代遗传,防止因子、序列和结构发生基因变异的内在要求。党确保“三个不变”,是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保证。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共产党的质、色、味不能变,这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建立在确保“三个不变”基础上。党确保“三个不变”,必须运用好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在新时代实践中,在保证党的性质、成色、特征始终不变上形成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关键词: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三个不变;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5-00014-06

2022年7月26日至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这是党中央向全党全社会发出的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动员令。谱写崭新篇章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为保证。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发展的重要成果,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鲜活经验的创新提炼。这“三个不变”思想的提出,对在极不寻常的复杂环境和风险挑战接踵而至的严峻情况下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政党的质、色、味的理论诠释和党确保“三个不变”的涵义演绎

从概念上理解,质、色、味是生物学常用的范畴,表示生命有机体的存在状态。谈到质、色、味,令人最容易联想到的是食物,一种食物变质了,色和味就必然改变了原样态、原知觉。理论研究中,许多学者把政党视为政治生命体,因此

收稿日期:2022-09-17

作者简介: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ZD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从逻辑上说，政党就与自然生命体一样有质、色、味的问题。党的建设话语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质、色、味都有明确的表达。

政党的质就是指组织的性质。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规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由这个性质决定的。

政党的色就是指组织的成色。如果说性质回答的是其为什么样的政党问题的话，那么，成色就是回答这个政党怎样来体现其性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色集中体现为他的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这给中国共产党染上红的色彩。我们党的话语中，红色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色，“红旗”“红军”“红星”“红歌”等词语表达了红的颜色标注，呈现出用不懈奋斗的热血浇筑的鲜亮色彩。

政党的味可以理解为组织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具有许多鲜明特征，例如，延安时期党中央提炼概括的三大优良作风、伟大建党精神铸造的中国共产党人鲜明政治品格，以及历史实践中形成的革命传统，还有党勇于自我革命，等等，这些都成为人民品中国共产党味道的具体方面。

政党的质、色、味形成内在关联的统一体。质决定色和味，色和味是质的外在观相，社会和人们从色和味的感知去评判政党的性质。从思想逻辑上说，什么样的性质决定了它的色和味是什么样的，而政党的质受到破坏往往是从色和味的改变开始。确保党“三个不变”，就是要把我们党的性质坚决体现在党的色和味的观相上，坚决把保持党的色和味与维护党的质相统一。由此而言，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贯彻党的根本宗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传统、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勇于自我革命等，就是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题中之义。

二、确保党“三个不变”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因工程

话语逻辑表现思想逻辑，党的百年历史实践中，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是党的建设永恒主题，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思想，为提出确保“三个不变”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以强调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先进性，采取清理不合格党员的举措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提出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作风的“两个务必”告诫，体现的就是确保党不变质的思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党对一些歪风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这讲的就是保持党不变质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两大历史性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胡锦涛同志领导党中央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强调党的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必须持之以恒加以保持。这些思想表明，党中央始终对永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着思想自觉和实践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用严要求、花大力气、出重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2]。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卓著成效，同时也暴露出党员干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纪律上的一些严重问题，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确保党“三个不变”就是因这个思想逻辑而提出的。

习近平总书记对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问题有许多重要论述。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主心骨”^[3]，“对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4]。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5]。这一重要论述写进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中，确保党“三个不变”思想得到强化。

从“两个务必”思想、拒腐防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到提出确保党“三个不变”思想，体现了党中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一脉相承和创新发展的思想脉络。深刻认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要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与党的基因工程紧密相联系。“红色基因”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创造性概念，他多次提出党的红色资源“要发掘好、运用好，丰富‘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内涵”，“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6]。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必须把推进党的建设同传承红色基因这两个工程相结合，为确保党“三个不变”提供保证。

质、色、味构成生物科学的三个辨识要素，是基因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基因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有机体的生命质量受基因影响很大。人的基因出了问题，就会患疾生病。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说到底就是要确保党的组织基因不变异、不变形、不变样。基因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遗传，二是变异。遗传使基因不断被复制和沿袭，变异则使基因的因子、系列和结构受到裂变和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确保“三

个不变”就是指必须保证党的组织基因代代遗传，防止因子、序列和结构发生变异。确保“三个不变”就是党的基因工程建设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加强建设，目的就是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决防止党的红色基因发生裂变或遭受破坏。

三、确保“三个不变”是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保证

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重大论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始终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新时代十年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论断，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认识，赋予“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把“坚持党的领导”摆在“十个坚持”的第一条，可见它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由于党的领导而实现根本扭转，也是历史事实。“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政治发展中，中国人民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以一些先进中国人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以及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政党力量，在探寻救国救民道路上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这些进步势力和政党组织没有把他们所代表的历史进步性与人民群众的力量主体性相结合，他们只是领导了变革和革命而没有去领导人民。

近代中国历史沿着先进政党领导力量选择的轨迹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大势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新型组织形态使它与此前的其他进步势力和政党组织截然不同。中国

共产党建立后不久即明确自己“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7]。在历史实践深入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努力宣传、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改变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格局，成功实现了一个伟大政党与伟大人民的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破坏旧世界的伟大斗争中赢得了领导地位，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发展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政治认同，“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共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十三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成就，振奋党心民心，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

从确保党“三个不变”思想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其内在逻辑就是“打铁必须自身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8]，“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9]，“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往往是灾难性的、颠覆性的”^[10]。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一项系统工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就必须把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辐射到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而要做到这一点，党首先要自己过得硬、站得住、行得正、

显得强。道理很简单，一个管党治党宽松软，党员和领导干部信仰不坚定、作风疲沓、纪律规矩不严以及党组织涣散的党，不可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就会衰减，党的领导就会落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思想，是与“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相联系的，这就鲜明揭示了确保党“三个不变”的思想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党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历史。”^[11]中国共产党的质、色、味不能变，这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等重大论断，都建立在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基础上。缺乏这个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基础，党的领导地位就守不好、立不牢、保不住。

四、运用好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确保“三个不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党的建设，尤其是十条历史经验中的“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自我革命”，是进行党的建设实践的直接内容。此外，“十个坚持”中，“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伟大斗争”“坚持理论创新”“坚持敢于斗争”等历史经验，都与加强党的建设密切相关。因此，确保党“三个不变”，必须充分汲取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而长期坚持。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总结概括“十个坚持”，“是

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2]。运用好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充分发挥历史经验的资源优势，必须在确保党“三个不变”上形成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第一，以党的理论创新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以科学理论的思想武装为本色，“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3]。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保持了鲜活性，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确保“三个不变”，必须长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强大武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两个确立”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中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以坚定理想信念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总开关”，“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14]。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信仰迷失、精神迷失，党变质、变色、变味首先从动摇理想信念开始撕破口子，把强党的灵魂丢了，保质、保色、保味就无从谈起。新时代十年伟大实践中，党中央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体现了思想建设是确保党“三个不变”的基础性建设。

第三，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15]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初心和使命是体现党的性质、党的成色、党的特质最具有代表性的标识，践行初心使命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是党的质、色、味的体验标识。新时代十年伟大实践中，把党的初心和使命铭刻于心，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党的建设不变的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终身课题，对于确保党“三个不变”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以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告诫全党，管党治党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必须“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16]。全面从严治党是保证党的质、色、味始终不变的具体实践，从严管党治党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制定和出台都以确保“三个不变”为原则。新时代十年伟大实践中，强化立党兴党强党的责任担当，保持忧患意识，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不断巩固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果，是党以硬朗的身板确保自身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内在要求。

第五，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17]。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把“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18]新时代十年伟大实践中，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敢于在自己身上动手术，树立保持党组织肌体健康的意识，创造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的鲜活经验，坚持发扬勇于自我革命精神，为始终保证党的性质、成色、特征不改变提供强大支撑。

第六，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提出“伟大建党精神”重大概念，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概括，揭示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指出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9]。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宗旨、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是党的性质、成色、特征的鲜明标记。新时代实践中，确保党“三个不变”，必须“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20]，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五、结语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呈现动态性，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党的建设随着实践的深入而发展变化是客观规律。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表明，社会主要矛盾、时代环境、历史条件不断在发生变化，党的历史方位、建设目标、工作任务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求变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然而，变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也是辩证的统一，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有很多东西需要变、必须变，不变就会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前进的步伐。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绝对不能变的，如党的光荣传统不能丢，党的优良作风不能弃，党的红色基因不能变，党的革命精神不能失，勇于自我革命品格不能改。这些东西变了，党的性质、成色、特征就变了。把变与不变辩证地统一起来，在与时俱进的求变中确保党“三个不变”，是新时代

新征程上走好新赶考之路的重要保证，也是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的点睛之笔。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03.
- [2][12][13][18][2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1、71、66、70、75.
-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393.
- [4]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党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6.
- [5][1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3-14、7.
- [6]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党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07+109+111.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62.
- [8][1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18、589+590.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1.
- [10]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22.
- [11]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12.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0+339.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76-377.
-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04.

责任编辑：鲍跃华

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

——基于湖北省秭归县的案例考察

方 帅

摘 要: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既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更是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效能的实践创新。通过对湖北省秭归县“人大代表在行动”的案例研究发现,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离不开三大机制,即组织统筹、资源整合和评估考核。其中,组织统筹是前提,资源整合是关键,评估考核是保障,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人大代表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参与基层治理,实现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益转化。

关键词: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图分类号:D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5-0020-06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支撑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2021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注重发挥人大代表作用”;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并进一步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这说明在当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以及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程中,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尤为重要,特

别是占全国各级代表总数94%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同时,部分地区创新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案例亦日趋增多。那么,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实现路径是什么?基于此,本文将以湖北省秭归县“人大代表在行动”为例,对人大代表如何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进行探析,以期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经验借鉴。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国内关于人大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既有研究

收稿日期:2022-10-08

作者简介:方帅,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研究”(22CZZ020)、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层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创新研究”(2022SJYB02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较为有限。通过梳理,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维度。一是关于人大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价值与内涵的研究。学界一方面从制度价值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人大代表参与基层治理可以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将代表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1];另一方面从应用价值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人大代表在基层社会所发挥的治理功能^[2]及其产生的民主绩效^[3],诠释我国人大代表“议行合一”的实践内涵。二是关于人大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类型及行为特征的研究。既有研究主要从地域、层级、性别、职业等比较维度把人大代表类型化,有针对性地考察不同特征人大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和行为习惯^[4]。三是关于人大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与策略的研究。学界集中于制度问责^[5]、技术嵌入^[6]、激励兼容^[7]、专项协同^[8]等方面,对人大代表有效参与基层社会的参政议政、矛盾调解、经济发展等治理事项进行深入研究。四是关于人大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困境与挑战的研究。由于人大代表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角色集”^[9],因此,其在参与基层治理中难免会陷入结构化困境^[10],面临着职责模糊^[11]、角色错位^[12]、能力不足^[13]、履职虚化^[14],以及选择性参与^[15]等挑战。

在国外,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更多是从选举民主和政党政治的角度研究代议制,而关于“代表参与治理”的研究则散见于代议制民主的相关成果之中,总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选举导向下的参与功能研究。基于西方选举政治和代议政治的实践,国外学者尤为关注代表参与选举和议政这两大功能,较少涉及治理功能。因此,Sally Friedman曾专门就参与功能方面的“代表之困”进行过系统著述^[16]。二是议行分开下的参与冲突研究。在实践层面,西方“议行分开”的治理格局,造成了代表与政府始终处于批评与对抗的冲突关系之中。为此,Brian Wampler提出用参与式治理来改造代议制民主^[17]。三是中西比较下的参与差异性研究。有学者曾先后对中法、

中印等国的代表参与治理进行过比较,将中国的人大代表描述为“参与式代表”^[18]。

不难看到,国内外的既有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它们仍存在不足之处:从国内研究看,较少有学者从全过程视角探讨人大代表在基层治理中的参与机制,尤其是对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实现路径关注不够;从国外研究看,西方学者更多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和话语体系为参照,对中国的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经验事实及微观机理了解不深。基于此,本文拟在阐释分析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理论意涵基础上,以湖北省秭归县“人大代表在行动”案例为背景,探析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实现路径。

二、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现实意涵

在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以及在推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程中,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正是对当下时代命题的有力回应,同时也是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真实写照,具有丰富的现实意涵。

(一)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需求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覆盖、全方位的民主,在我国主要以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为依托,将民主贯穿在日常工作的始终^[19]。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社会的落地过程中也有着诸多表现形式。其中,以人大为依托,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便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侧面,其具体体现则是人大代表借助密切联系群众的身份优势,全过程参与基层社会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各环节。

(二)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层社会的治理领域中,地方各级人大肩负着协同政府治理的重要使命。具体表现在基于人大代表的多重身份角色集,代表们可以依托各自的专业和特长在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履行相应的治理职能,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地参与基层治理。

(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有益创新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人大工作有了更高期待。因此,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成为人大提升工作质量的一项重要使命。唯有如此,人大代表才能不断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0]。基层社会探索出的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恰恰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项有益创新,也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探索,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21]。

三、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地方实践:以湖北省秭归县为例

秭归县位于湖北省西部,境内多山,地形崎岖,这一自然条件给当地的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为此,秭归县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于2012年在全县开启了“幸福村落”建设行动,并取得显著成效。为充分利用这一改革成效,同时,为破解代表履职时间短、效率低等难题,秭归县人大常委会自2017年6月起,提出“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项活动,并将其与“幸福村落”建设行动有机结合,探索出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有益经验,诠释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秭归县现有12个乡镇人大主席团,共有五级人大代表897名(不含重合数)。其中,全国人大代表2名、省人大代表6名、市人大代表35名、县人大

代表200名、乡镇人大代表654名,代表中的中共党员622名。在具体实践中,秭归县人大常委会将各级人大代表纳入基层治理体系,使其全过程参与民意收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各环节。

(一) 民意收集与传达

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实践中,人大代表首先要了解民众的现实需求,这就要求各级人大代表畅通民声传达渠道、创新汇集民意的方式。秭归县各级人大代表以所在的活动小组为依托,立足所在选区,探索出汇集民声的三种渠道,即集中走访与分散入户相结合、定期座谈与随机交流相配套、线上沟通与线下收集相补充。值得称道的是,每个选区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都张贴在人大代表活动室,便于基层民众随时联系。在汇集民需和民意基础上,为保证人大代表收集的民意有结果,秭归县人大常委会以回应为导向,根据群众的不同需求和事项分类解决民众之忧,具体可概括为四类情况,即政策类问题现场解答、纠纷类问题村内解决、公共性问题乡镇领办、完结性问题实时反馈。这些创新性做法较好地破解了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脱离基层群众实际需求的困境^[22],同时也避免了群众找不到人大代表的情况发生。

(二) 民主协商与决策

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民主协商与民主决策相辅相成,彼此增益,它们同时也是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实践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对此,秭归县人大常委会为确保人大代表充分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并最大化发挥应有作用,探索出形式灵活、独具特色的民主协商与决策方式。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协商场域移至村落田间和屋场。“屋场夜话”作为秭归县一个特色治理方式,被县人大常委会和各乡镇人大主席团充分利用。各级人大代表在所在乡镇人大主席团的组织下积极参与“夜话”活动,与民众和村干部共同商议村落内的重大事项和公共

服务。在这一模式带动下,秭归县村民自治的活力得到了进一步释放。二是将重点难点议题移至会上合议商讨与决策。具言之,就是将人大代表收集上来的意见和建议归类后,将其中一部分的重点和难点事项筛选出来形成议题,提交人大主席团,由代表审议讨论,并最终将形成的决议分类转交执行^①。

(三) 民主监督及其他

人大代表履行监督职能是其身份具备的应有之义,也是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要求。然而,过去部分地区囿于机制不全、交通不便等原因出现了人大代表监督虚化、问责“失语”等问题^[23]。为破解这一难题,秭归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健全监督机制、创新监督方法、优化监督流程等过程设计,使人大代表参与民主监督的行为得到落地。具体而言,在健全监督机制方面,秭归县人大常委会以监督规范、精准、及时为目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督制度,采取正式监督与非正式监督有机结合的有效监督方式;在创新监督方法方面,秭归县人大常委会采取监督下村庄、进屋场、入农户等方式,探索出了生活化监督;在优化监督流程方面,则是通过建立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的机制,使民主监督合规范、合程序。此外,秭归县人大常委会还成立6个副主任任组长的督导工作专班,每个专班负责2个乡镇,深入实地督导解决基层问题,并围绕当地的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重点工作与重点项目、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和依法任免干部等事项开展重点监督,确保权力用好、用对。

当然,人大代表除了参与上述基层治理之外,

还参与其他治理事务。例如,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秭归县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发挥各自优势,充分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中,既引资源又做公益,部分有职代表还兼任包村干部。在后脱贫时代背景下,秭归县各级人大代表又进一步参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工作,推动秭归县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四、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分析

透过湖北省秭归县的实践案例可以看到,人大代表之所以能够有效且流畅地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离不开秭归县人大常委会对这一创新实践进行的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组织统筹机制

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作为一项创新实践,涉及人大、政府、社会等多主体,需要借助组织化统筹来协调各方关系。从秭归县的具体实践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典型经验。一是有力的组织领导。秭归县人大常委会依托“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项活动成立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任组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任常务副组长,副主任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活动领导小组成立督导专班。实践证明,有力的组织领导易促成共同意志、凝聚强大力量,推动了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精准落地。二是有效的组织联动。基层治理纷繁复杂,人大代表在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要想实现特定的目标,常常需要政府、事业单位等多主体协同。因此,有效的组织联动机制必不可

注①:秭归县人大常委会就收集到的基层治理问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处置流程,具体如下。以“分级负责、分类交办”为原则,由各乡镇人大主席团统一整理相关意见和建议,并以书面的形式形成问题清单。其中,属于乡镇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各承办单位对一般事项应在交办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答复代表;对于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的,应当自交办之日起1个月内答复代表;属于共性问题,可以转成闭会期间代表建议进行办理。属于县级职权范围内的问题,通过活动领导小组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将收集的问题转交给相关责任单位,责任单位在交办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答复代表。活动中收集的不属于县级职权范围内的意见建议,由县人大常委会及时上报宜昌市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应当向县人大常委会或乡镇人大主席团报告,并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印发。

少,需借助组织联动推动功能联动。对此,秭归人大常委会在县委领导下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由县委、县人大、县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以及秭归县供电公司、人民银行秭归支行等多家单位组成。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和一名联系人。各乡镇人大主席团负责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在本乡镇开展活动。

(二) 资源整合机制

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离不开相应的治理资源。其中,较为关键的就是代表作为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代表履职所需要的信息资源的整合。从代表资源配置看,秭归县采取的做法主要是以乡镇为单位,各乡镇人大主席团根据代表所在选区,以“便于联系、方便工作、规模适度”为原则,划分若干代表活动小组和小分队。一般而言,按 15 人左右划为一个代表活动小组,秭归县现有 59 个代表活动小组,各代表小组可再进一步细化为若干小分队。例如,秭归县水田坝乡人大主席团将在该乡参加代表行动的五级人大代表共 84 人,划分为 5 个代表活动小组、25 个小分队。从信息资源整合看,秭归县人大常委会在全县范围内创建了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和人大微信公众平台,并建立了人大代表信息数据库,将县域内五级人大代表相关信息统一纳入相应的信息平台系统;与此同时,各代表活动小组还创建了各自的微信群、QQ 群等线上交流平台,便于信息资源的交互和疑难问题的探讨。结果表明,这一做法大大提升了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效率和质量。

(三) 评估考核机制

欲使人大代表参与基层治理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过程、全方位目标,还需相应的评估考核机制来保障。一方面是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和时间节点。秭归县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个人服务(走访群众、收集意见、回应诉求、解决问题、反馈通达度等)、代表小组活动(活动开展频率、群众满意度、代表满意度、部门反馈等)等全过

程参与绩效,建立系统、专业、精细的评估指标体系,并根据全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制定评估的时间节点。另一方面是建立台账制度与容错改进机制。各代表小组均建有电子或纸质的工作台账,并配备档案资料的专职管理员,根据医疗、教育、交通、扶贫等各项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逐一做好代表小组活动记录,实现工作“留痕”。各乡镇人大主席团需做好中期和年度档案整理、工作总结,并在相应阶段组织代表开展专项述职,对表现不佳的代表及时进行教育纠偏。同时,人大常委会每年也会对各乡镇人大主席团进行考核,并对全县人大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向县委作专题报告。

五、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更是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增强人大代表履职效能的实践创新。需要说明的是,各地在探索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实现路径时需因地制宜,找到一条符合当地发展实情的特色化模式,而不应采取“一刀切”或“拿来主义”。

参考文献:

- [1] 佟德志,漆程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复合优势与合力效能[J].理论与改革,2020(1):66.
- [2] 杨雪冬,闫健.“治理”替代“代表”?——对中国人大制度功能不均衡的一种解释[J].学术月刊,2020(3):62.
- [3] 徐勇,王元成.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06.
- [4] 刘乐明.全国人大代表个体属性与履职行为模式实证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108.
- [5] 陈明明,陈远星.代议制政府与代表制政府:一个理论

- 和历史的比较[J].学术月刊,2021(7):86.
- [6]郎友兴,吕鸿强.政治制度的技术嵌入:“互联网+”地方人大制度——基于浙江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的实践创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35.
- [7]涂锋.如何实现激励兼容——地方人大监督的机制创新[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4):42.
- [8]席文启.十八大以来人大制度实践的新发展[J].新视野,2022(1):5-6.
- [9]蔡文成.代表·回应·责任:人大代表制度的政治逻辑[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72.
- [10]王玲,申恒胜.乡镇人大制度的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向[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6):67.
- [11]郑旭涛.关于构建基层人大代表兼职责任制的思考——基于人大代表与选民联系的维度[J].学习与探索,2014(3):47.
- [12]孟宪良.人大代表参与社区治理的角色错位与归位[J].探索,2016(4):36.
- [13]张华民.提升地方人大监督能力:最新进展、主要问题、关键因素、重要途径——基于L市的实证调查[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7(6):35.
- [14]吴高盛.“标准化”引领基层人大工作实效不断提高——陕西省镇坪县有效破解基层人大履职行权“虚化”问题[J].人大研究,2017(8):18.
- [15]王雄.地方人大代表的选择性回应偏好及其原因——以M市人大为例[J].社会主义研究,2017(1):90.
- [16]Sally Friedman.Dilemmas of Representation: Local Politics, National Factors, and the Home Styles of Modern U.S. Congress Members[M].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3.
- [17]Brian Wampler.Particip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Using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to Transform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J].Polity, 2012(4): 666.
- [18]Guan T, Liu T. Participatory Representation in a Non-western Context: the Case of Homeowner Associations in Beijing[J].Urban Affairs Review, 2021(4): 987.
- [19]佟德志,王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素与结构[J].探索,2022(3):42.
- [20]杨庆育.人大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路径[J].人民论坛,2014(33):64.
- [21]唐皇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进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2.
- [22]张翔.城市基层制度变迁:一个“动力-路径”的分析框架——以深圳市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发展历程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8(4):32.
- [23]卢智增.人大问责机制创新问题研究[J].理论导刊,2016(12):5.

责任编辑:鲍跃华

省域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基于东部发达省市的分析

王树华 孟 静 查婷俊

摘要:作为区域现代化的重要空间单元,省域现代化发挥着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既是落实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环节,又对市域现代化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东部发达省市具备现代化先行的现实基础,不仅在发展水平上处于全国前列,而且在发展结构上也优于全国大多数省份。根据党中央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安排,东部发达省市可以在加快发展动力转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践行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面推进绿色转型等方面综合施策。

关键词:省域现代化;区域现代化;实现路径;东部发达省市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5-00026-08

当前,现代化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实现现代化,区域发展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点问题。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实践梳理后发现,区域率先是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1]。学术界从区域现代化角度的研究虽取得丰硕成果,但深入分析后发现,多数研究成果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进展结合并不紧密,且从区域率先视角研究省域现代化的成果相对较少。考虑到省域现代化在区域

现代化中的极端重要性,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省域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分析研究。

从我国现代化发展情况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2]。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顺

收稿日期:2022-09-30

作者简介:王树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区域现代化;孟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发展、区域现代化;查婷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与产业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以区域性实践为全国现代化建设先行探路的思路举措研究”(21ZKB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应现代化发展的区域率先规律，省域现代化对全国现代化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不可或缺。东部发达省市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推动省域现代化发展上具有先发优势。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江苏六省市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党中央也赋予了上述省市特殊的使命要求。例如，支持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支持上海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等等。基于此，本文以六个东部发达省市为例，结合党中央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安排和目标任务，从可能性和可为性两个维度对省域现代化展开分析。在可能性维度，侧重于分析省域现代化的发展定位和东部发达省市现代化走在前列的现实基础；在可为性维度，侧重于分析省域现代化的前景展望和实现路径。

一、省域现代化：区域现代化的重要空间尺度

现代化产生和发展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展开，必然落地于特定的空间。因此，现代化具有空间属性，区域现代化就是现代化实践在具体空间上的现实落地。在区域现代化的内涵研究上，崔大树（2002）从时空和动力角度分析了区域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他认为，区域现代化是某一地区在现代化动力（工业化、城市化、科学技术和信息化等）和制度革命的共同推动下发生的复杂系统的时空演变过程^[3]。胡福明（2003）从区域率先现代化的视角，指出区域率先实现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体现为“某些国家或区域的率先现代化现象”，在一国内部则体现为“某些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超前性”^[4]。刘旺洪（2018）则认为，区域现代化是以科技革命和社会进步为动力，不同区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知识社会转型过程^[5]。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区域现代化是某个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变革，也指以现代化目

标为导向的区域发展过程。

现代化先行国家达到现代化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但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现代化发展既然要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就不太可能通过自然发展实现，而需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能动作用，以加速现代化进程^[6]。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国家—省—市—县”等各级政府对现代化的推进发挥着重要的组织、协调、支持、保障作用，对现代化的推进形成强大合力。其中，省域是国家现代化和市域现代化的枢纽环节，发挥着落实执行国家战略、协调动员基层力量的作用，可以有效链接起国家制度优势和基层创新优势，是区域现代化的重要空间单元。

（一）省域在区域现代化发展中的枢纽作用

一般而言，省域现代化是现代化在省级空间上的全面投射，是涉及各领域、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既是落实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环节，又对市域现代化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省域现代化之所以是区域现代化的重要空间尺度，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第一，省域的空间范围具有相对稳定性。当前的行政区划调整主要集中在市县级层面，省域作为一级行政主体的区域稳定性较强，有利于现代化政策措施的连续执行和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第二，省域具有一定的决策自主性。省域政府可以有效调动省市县三级的资源和积极性。省域既是经济区也是行政区，在省域范围内市场调控主体、社会发展主体、决策主体、治理主体与行政主体相一致，可以进行一体化的决策、制定和推行规则，有利于实现协调发展。

第三，省域具有较强的内部联系。尤其是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和完善，省域内部要素流动性增强，规则相对统一，信息更加透明，更有利于资源优化组合，激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当然，以省域为现代化单元不是要限

定区域现代化的发展边界。事实上，现代化需要各种要素的跨省域自由流动，省域同样可以在省际合作、城市群合作和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省域现代化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发展定位

区域发展不平衡决定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应采取区域率先推进的模式。其中，省域作为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单位，是最适宜区域整体推进的空间尺度。省域现代化在促进全国现代化、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与责任。

第一，为全国现代化积累创新经验。经济发达省份可以立足省情制定更符合实际需求的政策措施，进行渐进式的、更为多样的现代化创新，探索现代化的多样化路径和模式。同时，经济较发达省份通过现代化发展的先行示范，可以对其他省份发挥引领带动和目标导向作用，有利于从总体上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7]。其他省份则可以学习发达省份现代化经验，从而推动现代化在发展空间上实现从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转变。

第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发展的梯度差距显著。省域单元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特定的生产组织模式，在文化历史传统和心理感情上也更为一致，有利于达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因此，以省域为具体组织单元推进现代化，可以更好地立足本地实际，极大提高政府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效率和可操作性。省域空间范围适度，囊括了中心城市和腹地、城市和乡村，有利于区域现代化过程中梯度推移、极化涓滴或辐射带动作用的有效发挥，更有利于城乡之间的互动和一体化，从而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腹地的支撑作用，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使得现代化更可持续、更加协调。

第三，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作

为一级治理主体和财政主体，省级政府可以立足全省发展公共事业、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发展，并积极推动省内各市县间的合作，对确保公平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现代化，还包括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等公共性发展目标。在省域范围内居民联系更密切、人员流动更频繁，决定了其对省内公共服务公平性的要求更高。省级政府通过财政资金支持、优化配置资源等措施，在全省范围内统筹公共服务供给、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更重要的是，省级政府立足省域现代化发展中的短板，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增加对农村、郊区等相对薄弱地区在科教文卫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供给，对推动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与乡村的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以省域为单位推进现代化，可以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既能体现当地发展实力又能满足社会公平需求。

第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省域层面的主动作为和责任担当。作为社会治理的中观层面，省域层面的社会治理是联结国家治理的顶层框架设计和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的枢纽环节。省域治理需要在贯彻国家治理意志和激发市县治理创新积极性之间取得平衡，既要确保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又要为市县等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预留一定空间。因此，省域治理现代化可以有效协调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单元，实现维护中央统一管理和地方有效治理的双重目标，有助于控制治理风险、提升地方治理效能，进而更好地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8]。

二、何以可能：东部发达省市具备现代化先行现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本文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江苏六个东部发达省市为典型代表，从发展水平和发展结构两个维度对东部省市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基础进行评估与分析。

(一) 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达到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水平

从人均 GDP 来看，考虑到国际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采用 2019 年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江苏六个东部发达省市统计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分析。按照世界银行对各经济体 2019 年人均 GDP 的统计数据，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人均 GDP 分别为 44540 美元、5575 美元、5080 美元和 780 美元。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 GDP 为 9040 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 GDP 为 2177 美元。依此对照，如果按人均 GDP 衡量，以当年汇率折算，上述六个东部省市均已达到中等偏上经济体的发展水平。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1978 年至 2020 年，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江苏六个东部省市 GDP 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9.6%、9.4%、12.0%、11.6%、10.5%、11.5%，均高于同期 9.2% 的全国年平均增长率，由此带来了东部六省市占全国经济的比重逐步提高。截至 2021 年，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江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3.52%、3.78%、10.87%、6.43%、7.27%、10.17%，分别位居全国第 13 位、第 10 位、第 1 位、第 4 位、第 3 位和第 2 位。

(二) 发展结构：优于全国大多数省份，基本达到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水平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第一产业比重趋于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比重将逐步提高，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从西方发达国家情况来看，第三产业比重大多位于 60%—70% 之间。作为都市型经济典型代表，北京和上海早在 1993 年和 1998 年分别实现了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对第二产业比重的超越。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四省则先后在 2013 年、2015 年、2015 年和 2017 年实现了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比重的赶超。近年来，东部六省

市三次产业结构水平得到进一步优化。截至 2021 年，北京市三次产业结构为 0.3 : 18.0 : 81.7，上海市三次产业结构为 0.2 : 26.5 : 73.3，广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为 4.0 : 40.4 : 55.6，浙江省三次产业结构为 3.3 : 40.8 : 55.9，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为 7.3 : 39.9 : 52.8，江苏省三次产业结构为 4.1 : 44.5 : 51.4。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东部省市三次产业结构均已基本达到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水平。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来看，一般认为，消费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实践表明，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服务业比重的上升，消费率呈现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的变动过程，在现代化基本完成后消费率将达到峰值并逐步趋于稳定。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保持在 60% 左右的水平。从东部六省市的情况来看，北京（2019 年）、上海（2017 年）、广东（2019 年）、浙江（2019 年）、山东（2017 年）、江苏（2018 年）六省市最终消费率分别为 56.1%、57.3%、48.9%、50.4%、48.4% 和 50.5%。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东部六省市消费率大约有 10% 左右的差距。消费率略低的原因，除了国民消费习惯等因素外，还与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高有关。

从城镇化率看，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农业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以及促进城镇化发展各项政策措施的深入推进，农村富余人口将逐步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从而提升城市化率。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多在 80%—90% 之间。根据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江苏城镇化率分别为 87.5%、89.3%、74.6%、72.7%、63.9%、73.9%，与同期西方发达经济体水平大体相当。

根据以上分析，东部发达省市已具备先行现代化的基础和实力。东部发达省市不仅在发展水平上处于全国前列，已达到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

水平；而且，在发展结构上也优于全国大多数省份，基本达到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水平。

三、东部发达省市现代化走在前列的前景展望

根据党中央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安排，结合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和现实基础，东部发达省市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走在前列。

（一）在加快发展动力转换上走在全国前列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作为科教和人才资源集聚的高地，东部地区有责任、也有条件在发展动力转换上先行一步，加快推动发展动力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第一，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从 0 到 1”的原创性突破；第二，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创新成果在更多领域实现“从有到强”的转变；第三，增强协同创新能力，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推动“官产学研用”等多主体的协同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推动产业与科技深度融合，形成紧密型创新共同体。

（二）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

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新发展阶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通过优化相关政策环境，力争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东部各省份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可以在以下两个层面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积累经验。其一，在构建新型区域合作关系上实现突破。东部发达省市依据合作共赢、利益共享原则构建新型区域合作关系，有望加快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其二，在促进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实现突破。东部省份通过率先打破区域壁垒，推动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均

等化。

（三）在实现共同富裕上走在全国前列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从全国情况看，我国还处于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左侧的上升期。但从东部发达省市的实际来看，预计东部省份将先于全国跨越“倒 U 型”曲线的拐点，进入曲线右侧的下降阶段。为加速这一拐点的到来，东部发达省市聚焦缩小区域、城乡和收入“三大差距”的发展目标，通过采取务实举措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有望不断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一，通过构建和完善先富带后富的区域合作机制，充分发挥东部发达省市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综合运用对口支援、对口合作、东西部协作等多种方式，激发欠发达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构建和完善省（市）域统筹发展机制，以重大项目和重点产业合作为载体，有望实现省（市）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可以在缩小地区差距上取得实效、作出示范、走在前列。

第二，通过统筹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完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有望让更多转移人口更公平地享受新型城镇化成果，可以在缩小城乡差距上取得实效、作出示范、走在前列。

第三，通过探索居民稳定增收的有效机制，采取提高受教育水平、强化创业支持、做好收入再分配调节等务实举措实现“扩中”“提低”，有望加快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可以在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上取得实效、作出示范、走在前列。

（四）在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上走在全国前列

人的现代化是区域现代化的主体动力，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列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东部发达省市人文底蕴深厚、人力资源富集、人类发展指数全国领先，具备推动人的现代化走在前列的经济基础、人文优势和行动自觉。

为此，东部发达省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通过紧扣“人的现代化”主线，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立足推动实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有望实现从人力资源大省（市）向人才强省（市）转变等目标，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具体而言，东部发达省市可以在提升人的素质能力、涵养人的道德习惯、提高人的幸福感获得感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五）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走在全国前列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内在价值追求。从历史实践来看，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城乡分化、发展不均衡乃至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的原则，这充分说明了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性。

东部发达省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可以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背离公平正义问题进行前瞻性预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贯彻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追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四、东部发达省市现代化走在前列的实现路径

推动东部发达省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走在前列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谋划，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全面绿色转型等多个方面共同

发力、综合推进。

（一）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全面增强产业竞争力

1.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重点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全面梳理东部发达省市重点产业、骨干企业发展中需要突破的“卡脖子”技术难题，立足东部发达省市科教资源丰富、市场规模巨大等优势，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发布攻关项目，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参与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等领域的技术攻关。要进一步加强官产学研合作，引导和支持行业龙头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机构，通过组建国家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等方式构建紧密的创新联合体。

2. 加强高端资源要素整合，提升对重点产业的控制能力

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在产业行业标准制定、产品品牌建设的培育和支持力度。培育一批掌握标准话语权、具有品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增强对全产业链的控制能力。着力推动科学技术与重点产业的深度融合、金融业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创新要素在重点产业发展上的高度匹配，显著增强重点产业对全球高端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做到重点行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要素“为我所用”，从而真正实现东部发达省市在重点产业发展上的自主可控。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显著提高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着眼于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千方百计促进高质量就业。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实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要立足“扩中”，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优化，通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创造更多的中等收入就业岗位，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奠定产

业基础和就业基础。立足“提低”，瞄准低收入人群，加大教育投入和职业培训力度，消除任何就业歧视制度，积极扩大中低收入人群就业空间，推动充分就业。

2. 完善分配制度

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着力健全和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环节，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健全和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政策制度，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形成体现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在再分配环节，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对于省级政府而言，可行的抓手是通过公共财政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增加居民“隐性财富”；在三次分配环节，营造民心向善的良好氛围，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对慈善文化、慈善理念的宣传教育，着力加强对慈善捐赠人和慈善从业人员的精神鼓励，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慈善捐赠的配套政策体系，在全省上下形成主动参与慈善捐赠的行动自觉^[9]。

3.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器、民生安全网。要不断健全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提升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社会保障发展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一，要在提升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的同时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实现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间的均衡配置和充分共享，切实缩小教育在区域和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实现教育公平。第二，要统筹抓好人民健康、公共卫生和医疗能力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首要位置，着力补齐基层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和能力，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第三，要加快发展养老事业，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加快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保障水

平，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三) 强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绿色转型

1. 构建绿色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

加快建立健全绿色技术交易市场，推动绿色技术在行业内的高效流动；加大绿色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力度，推动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加强对绿色创新技术的金融支持，进一步加大政府对绿色产品的采购支持力度，助推绿色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2. 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

实施重点行业、重点园区绿色化改造工程。一方面，推动高耗能、高污染等重点行业的低碳减排。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低碳减排技术，提高产业绿色化发展水平。鼓励和支持企业以绿色化、智能化为方向，打造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推动制造过程智能化升级。另一方面，提升园区的绿色化发展水平。进一步优化园区的产业布局 and 循环经济建设，共建共享园区环保公共设施，推动园区能源高效利用、废物综合利用，促进园区循环式发展。

3. 倡导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引导居民优先采购绿色标志产品，强化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意识，推动垃圾分类和减量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推动全体民众衣食住行全过程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变。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体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居住意识，在全社会范围形成绿色生活新风尚。

参考文献：

- [1][4] 胡福明. 中国沿海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J]. 江海学刊, 2003(1): 78-79.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 3. (下转第 44 页)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属性论析

骆平 张成明

摘要: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超越西方多党制、两党制的新特点和政治优势,是对世界政党政治文明的卓越贡献,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范式。本文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团结、民主、和谐”的本质属性为研究对象,探究本质属性提出的学理依据、相互关系,以及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越性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属性;团结;民主;和谐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5-00033-07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事物的本质属性,是指事物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是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固有的、决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性质、面貌和发展的质的规定性。因此,这种属性应包括基本的三个方面:第一,本质属性贯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始终;第二,本质属性规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变化发展的方向;第三,本质属性决定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类型政党制度的根本区别。《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把“团结、民主、和谐”概括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三大本质属性,这既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发展的深刻总结与精辟概括,更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规律性的科学认识和高度凝练。

研究和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属性,对坚持好维护好发展好这一伟大政治创造,向世界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特优势,提升国际话语权和牢固树立制度自信等具有重大意义。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早已展开研究。张献生认为,政党关系和谐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是政治方向的一致性、根本利益的共同性、党际关系的平等性、基本理念的合理性等因素共同决定的^[1]。李燕奇认为,追求和谐是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起点,体现和谐是多党合作制度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内容,实现和谐是多党合作制度的本质特征^[2]。齐惠认为,“民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标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属性上的人民民主、功能上的共识民主、形式上的协商民主,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中国新型政党

收稿日期:2022-08-03

作者简介:骆平,重庆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历史与理论;张成明,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多党合作理论与政策。

制度特质，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3]。林尚立从政治学原理出发考察了中国政党制度与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他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源于人民民主运行的内在要求，是人民民主实践与运行的制度结果，反过来中国人民民主的实践和发展也离不开政党制度的健全与完善^[4]。总的来看，这些研究从制度的功能、价值、历史演化等不同视角探究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深度分析了“某一具体”属性在塑造制度特质中的作用，但缺乏对本质属性整体性的研究，更没有研究本质属性的生成机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与运行方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提出的学理依据是什么？本质属性之间有何内在关联？又在多大程度上彰显制度优越性？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属性的学理分析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政治生活离不开三大力量——政党、国家与社会，政党作为整合的主体，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承担着利益综合、利益表达与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当一个国家不同政党之间以一定的程序方式和制度规范建立稳定的结构，特别是形成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时，就产生了政党制度。也就是说，政党制度的实质必然存在于三种关系中：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处理这三种关系的差别构成了不同类别的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为“新”，主要集中体现在它处理三种关系时展现的理念与方式，这些理念与方式又逐步内化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

（一）团结：政党与政权关系的具体体现

在政党制度中，政党与政权关系是指政党在政权中的定位，以及各政党在多大程度上执掌、参与和影响国家政权运行。中国各政党在处理与国家政权关系中形成了团结这一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救国、

兴国、富国、强国道路上创立、发展并不断完善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团结救国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各方面力量，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由此确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团结兴国的力量，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中的团结合作，充分激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打赢抗美援朝战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上的积极性，使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风雨同舟，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格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团结富国的力量，极大地调动了各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规范化、程序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凝聚团结强国的力量，大力推进多党合作理论、政策和实践创新，加强对多党合作事业的全面领导，新型政党制度彰显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多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在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形成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行动，汇聚起强大社会合力。

（二）民主：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

中国各政党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中形成了民主这一本质属性。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从这一基本点出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运转中必须最大程度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最大限度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

国家,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根本一致性构成了政党合作的坚实基础,使多党合作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需要不同的政党来反映这种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使多党合作成为必需。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代表各阶层人民具体利益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真诚合作,将“公意”和“众意”统合到政治和社会发展实践中,最终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路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体现了一套新的民主机制,即协商民主。经由这一科学的制度设计,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环境保护等国家重大政策和重要事务方面的问题进行充分协商,坚持在协商中求同,置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通过反复协商征求意见、理性审慎决策施策,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施策的有效性。这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在决策施政时固执己见、排斥异己、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在协商中求同,着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重视加强对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的支持保障,优化政治资源配置,形成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确保了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运转。

(三) 和谐:政党与政党关系的具体体现

中国各政党在处理与其他各政党关系中形成了和谐这一本质属性。在创立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斗,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发展出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更简明地说,这种反映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上的“和谐”属性,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

与民主党派的“亲密友党”关系。

一是患难与共的盟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各政党的共同目标。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达成思想政治共识,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方针,在各种挑战和困难面前长期并肩战斗、风雨同舟。

二是同心同行的挚友。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也不是旁观者、局外人,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他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努力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三是过失相规的诤友。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外在的激烈对抗;不是要消灭不同和分歧,而是要对不同和分歧进行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6]。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始终遵循“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原则,做彼此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诤友,而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更自觉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这种监督不是互相拆台、互相倾轧,而是互相帮助发现和改正错误、减少失误,不仅不会减少彼此之间的和谐,反而能增进信任、促进合作。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大家互相帮助,有了错误加以批评,共同进步。同时,也采用自我批评的办法,各民主党派也进行自我批评”,“过去他们不信任共产党,共产党也不那么信任他们。大家在一起工作,搞久了,常常见面,慢慢地就互相信任了”^[7]。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属性的历史定位与逻辑关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这一创造过程，既是实践发展的结果，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属性贯穿于其萌芽、形成、发展、完善的各个阶段，而日臻成熟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同样强化和凸显了本质属性。

（一）团结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起点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就是团结奋斗^[8]。当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各种救国方案在中国大地轮番“试验”，中国也曾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自己，用革命形式改天换地，团结带领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中国人民共同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9]。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探索与其他政党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过程中，部分领导人接连犯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使党遭受了严重损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和反思建党以来党的事业成败经验基础上，对加强与国内政党团结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例如，在团结的范围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10]。在团结原则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吸引和团结民主党派共同奋斗，但要注

重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在“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而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11]，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在团结方式上，毛泽东同志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12]。抗战时期多党合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进一步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提供了理论指引、扫清了思想障碍。在延安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三制”政权积极尝试与党外人士开展合作；在重庆等抗战大后方，则是通过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党的各级机构开展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合作，构成了“最广泛的团结、最真诚的合作”。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给予了最热烈的响应。他们纷纷汇集到中国共产党旗帜下，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努力。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等共同参加了会议，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的盛会，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团结大会，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也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确立。

（二）民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坚实支点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诉求。民主革命时期，正是在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在与国民党一党独裁作斗争、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找到了彼此的共通之处，双方在民主宪政运动、支持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维护旧政协决议、反对内战等一系列民主运动中强化了合作方式、培育了合作传统，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打下了牢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

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然而在新中国初期,党内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看不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甚至对在革命胜利后民主党派是否有必要存在提出过质疑。对此,毛泽东同志形象地用“一根头发”和“一把头发”的比喻,严肃批评了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错误认识。他指出,“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13],告诫全党要重视民主党派工作。为此,1950年3月和1951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推动了各民主党派组织健康发展。这也表明,在新的形势与背景下,仅靠“团结”已经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需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激活“内生动力”,在嵌入国家治理格局中彰显自身无可替代的价值与优势。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根据中国阶级状况发生的深刻变化,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大明确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党处理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八字方针”。“长期共存”强调的是民主党派在中国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互相监督”强调的是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作用,宣告了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迅速恢复。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将新时期的民主党派界定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为新时期多党合作指明了方向。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多党合作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势,确立了中

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和政策,使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调动了各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89年,在深刻总结与民主党派合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明确了民主党派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参政党地位,提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和监督作用的各项制度措施,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走上了制度化轨道。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纳入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1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取得政党协商更加规范有序、参政议政更加精准有效、民主监督开辟崭新领域等新成就。

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民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坚实支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得越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越能得到巩固,越能在中国国家治理格局中展现独特价值。

(三) 和谐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落点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和谐往往是与安定的政治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

设必不可少的客观要素。毛泽东同志认为，和谐的政治局面应该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15]。邓小平同志对和谐安定的政治环境尤为重视，他指出如果中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搞三权分立，那么中国必定陷入动乱。“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16]江泽民同志鼓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做我们党的亲密诤友。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统一战线中努力创造团结、民主、和谐的气氛，广开言路，使大家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能够充分地反映出来”^[17]。胡锦涛同志指出，“发展我国各政党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的和谐政党关系，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18]。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局和谐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新时代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为维护和谐稳定局面的“定海神针”。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属性的逻辑关联

“团结、民主、和谐”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关联的整体。团结属性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起点，没有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团结与领导，也就不会产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效能的坚实保障，只有建立在民主之上的团结，其范围才能做到最大，和谐也有其依托；和谐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懈追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过程就是在团结与民主基础上，找到和消灭不和谐因素，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团结大联合的最和谐状态的过程。

四、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属性彰显先进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超越西方多党制、两党制的新特点和政治优势，是对世界政党政治文明的卓越贡献，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范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属性是点明旧式政党制度之“弊”、映衬新型政党制度之“新”、理解和宣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先进性的“金钥匙”。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团结”“民主”“和谐”三大属性出发，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弊端，实现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超越。从“团结”看，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从“民主”看，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能真正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只能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从“和谐”看，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不是西方政治谱系中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对立、竞争关系，而是目标、利益与价值一致的政治共同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根本上跳出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政权更迭频繁的弊端，杜绝出现“否决政治、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情况。

总之，世界政党制度具有多样性，没有也不可能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政党制度。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加快向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输出所谓“民主政治”模式的步伐，企图以资本主义来终结历史，这是极其荒谬也是可笑的。那些移植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除少数完成转型外，大多数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对此，即便是“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社会来说，要实现自由西方的现代性非常困难”^[19]。中国依据历史传统

和现实国情创造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走出了中国政治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契合中国发展需要,这种经过历史考验的新型政党制度,在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的同时,也应该可以为众多处于发展变革中的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仍需要不断完善,尤其要在全面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扩大团结、发扬民主、增进和谐等方面健全制度体系、激发制度效能,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 [1][6]张献生.政党关系和谐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2):13-17、16.
- [2]李燕奇.和谐的政党关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兼论多党关系和谐是多党合作的本质属性[J].新视野,2007(1):66-73.
- [3]齐惠.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标识[J].党建研究,2021(11):49-51.
- [4]林尚立.政党制度与中国民主:基于政治学的考察[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335-343.
- [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5.
-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
- [8]人民日报评论部.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更加坚定走“必由之路”的自信[N].人民日报,2022-03-17(5).
- [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 [10][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1、741.
- [1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86.
- [13]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6.
- [14]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1).
-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3.
-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4.
- [17]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39.
- [18]胡锦涛.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EB/OL].(2014-02-26).http://www.rmzxb.com.cn/c/2014-02-26/298115_1.shtml.
- [19]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郭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14.

责任编辑:鲍跃华

论多党合作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

张金鹏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是我国的政党制度,更是我国基本民主制度之一,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多党合作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多党合作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保障;其次,多党合作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桥梁;最后,多党合作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多党合作;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型政党制度;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5-00040-0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提出 100 周年,也是“五一口号”提出 74 周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顺利召开了新政协会议,开启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统一战线,还是多党合作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在中国民主制度发展和民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民主制度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核心要义是“以人民为中心”,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当家作主”要求超越投票民主而实现人民民主生活的全过程化和实质化,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实践路径和实现过程来看,包括全链条人民民主、全覆盖人民民主和全方位人民民主等;从政治制度上看,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从组织形式看,包括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从民主形式上看,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统一,是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不论从哪个方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已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组织形式和实践路径。

收稿日期:2022-10-08

作者简介:张金鹏,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一、政治制度的保障作用

“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缺乏现实制度支撑，民主就没有根基，要坚持用制度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保障。”^[2] 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看作是由不同的具体民主政治制度综合而成的制度体系或系统，是多种制度的复合体。从我国民主制度的构成看，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这些制度从不同的角度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制度基础，从而全方位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体（政权）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党政治基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保证少数民族群众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则是有效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基础性制度。这些制度从政权基础、政党基础和民族、群众基础等方面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全方位的制度保障，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系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完整制度链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上广泛、真实、管用的制度优势，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思想和人民利益的全局性、根本性与长远性。”^[3] 理解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从这些制度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秉持系统论的思维和方法。

由以上四大制度构建起来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系是超越西方民主制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制度。首先，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相比，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行的“议行合一”的民主制度，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立场的集中表现；其次，与西方政党制度比较，全过程人民民主采

取的是与中国历史和国情相适应的政党制度，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长期共存、平等协商与合作；再次，与西方的精英政治相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超越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狭隘性，真正实现了多数人的民主；最后，与西方的“投票民主”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统一，超越了西方民主的形式主义，实现了实质民主。这种民主制度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创造的新型民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精神在我国的实践成果，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具有世界史和人类史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政党制度既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而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执政党与参政党既相互制约监督又相互协商合作的政党制度。”^[4] 在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从而创设了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中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新型政党关系。西方政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往往导致政党之间的对立甚至对抗；在多党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协商和合作的关系，很容易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共识，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方面成员广泛参与的制度化渠道。”^[5] 在多党合作制度中，各民主党派既是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的主体之一，又是民主协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主体之一。各民主党派一方面可以通过其成员担任人大代表实现对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选举权，实现其对国家决策的决定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人民政协实现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之间的政党和政治协商。通过政治协商，

各民主党派可以深度参与党和国家的决策形成过程，对决策的形成和制定提出建议和发挥影响，在决策实施的过程中参与对决策实施情况的有效监督，从而保证各项决策顺利执行和落实。简言之，“协商民主不仅对选举民主具有重要的弥补功能和促进意义，而且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个层面，都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有功能和制度优势”^[6]。

二、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

人民当家作主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畅通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实现下情能够上传，上情能够下达，实现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各级人大代表实现民情民意的上传和决策政策的下达，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与它们所联系的界别群众进行意见、观点的交流和沟通，通过政协委员和专门委员会实现上传下达的作用，保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由此，多党合作制度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过程中，起到了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

首先，多党合作起着民情民意上传和凝聚民心的作用。“参加民主党派或者通过民主党派表达诉求、反映意见、提出建议是我国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重要渠道和形式之一。”^[7]多党合作之所以是我国民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广泛联系社会的不同界别以及这些界别所代表的广大群众，并在这种接触和交流中获取来自不同界别的社会舆情，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和利益诉求，从而实现“从群众中来”的民主集中的过程。多党合作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上传”的功能，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具有组织上和资源上的优势。“各民主党派作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主体，是利益表达和综合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化形式和制度化渠道。”^[8]各民主党派作为政党组织，在联系群众、收集民意上可以发挥其组织优势和

专业优势。通过政党的力量来进行社会调查、座谈访谈等，克服了松散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在这方面的由于力量不够而存在的缺陷。同时，各民主党派成员还是各界别和领域中的专业人士，大多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活动能力，能够以专业的水平和方法沟通群众，获取民意，科学地分析、归纳和总结国情、民情，并形成系统科学的结论和建议提交给党和政府，实现民情民意的上传。

其次，多党合作起着将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政策意图下达的作用。我们已经知道，多党合作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以及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政策的过程中起着民意上传的作用。反之，在国家政策实施、执行和贯彻过程中，多党合作则构成将国家意志和政策意图转化为民意，为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和执行的“下行”通道，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多党合作这一功能或作用的发挥，从主体上看主要通过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实现，从方式上看，则“主要是通过政策宣传、政治动员、议政建言、政策监督、信息反馈等方式”实现^[9]。在我国，国家政策是在广泛的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意见统一后制定的，因此拥有广泛而深厚的民意基础。也正因为此，政策制定先要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利用各种形式、采取各种方式将制定政策的意图和执行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政策执行过程所要遵循的原则等在群众中进行解释，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全面掌握这些政策的基础上，准确理解政策意图和政策内涵，在政策形成与制定过程中形成共识，在政策执行和落实过程中将之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最终使政策得到顺利以及全面的执行、落实和贯彻。政策制定后，各民主党派不但会在本党派内进行解读、解释和宣传，使党派成员深刻领会这些政策的内涵和意图；而且会在他们所联系的相应界别群众中解读、解释和宣传，将国家意志和政策意图转化为群众的意志和精神动力。也就是说，多党合作在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政策形成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协商实现民意上传的作用，在党

的路线方针和国家政策制定后的执行环节通过各自的解读、解释和宣传实现了“上意”下达的作用。这一过程，从表面上看，是人民群众被动接受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政策的过程，实则是人民群众在准确理解政策意图的基础上将国家意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集中体现和最终实现的过程。

最后，多党合作的桥梁作用实现了人民意志、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最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政策形成和制定过程中，正是多党合作通过政党协商和政治协商将界别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愿望传递到党中央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使民意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在信息传递和意志聚散的过程中，实现了人民意志、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内在统一和相辅相成，构成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集中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性、全覆盖性和全方位性，实现了多数人民主、实质民主，凸显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科学性、正义性和先进性。

三、贯彻落实的路径作用

多党合作不仅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具有制度保障和桥梁作用，还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得到贯彻落实和最终实现的实践路径或实现形式之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简单的投票民主，人民群众不只是在投票时才能行使民主权利；也不是简单的选举民主，人民群众不只是在选举时才能行使民主权利；也不是会议的民主，人民群众不只是在会场内才能行使民主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人民群众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多党合作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路径，或者说是重要的实现形式。

首先，多党合作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之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个环节，

这五个环节依次更替、环环相扣，形成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整体。多党合作始终贯穿于这五个环节之中，是实现整个民主链条的重要形式和路径。在民主选举环节，各民主党派通过自己当选的代表和委员实现对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选举。在民主协商环节，一方面通过政党协商，代表各自联系的界别实现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民主协商；另一方面通过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实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之间的广泛协商，从而使得我国的协商民主成为涵括各界别各领域的实质民主。在民主决策环节，多党合作通过上传功能，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意见通过政党协商和政治协商集中起来，传递给国家权力和决策部门，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即实现民主决策。我国的重大决策都是在民主协商基础上广泛采纳人民群众的意见而作出的，多党合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是举足轻重和不可忽视的。在民主管理环节，各民主党派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使得管理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相互沟通、相互反馈和相互协作的过程中，使得社会管理具有广泛性与合作性，使得管理始终保持其民主性，最终实现民主管理。在民主监督环节，各民主党派作为与中国共产党“相互监督”的一方，构成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主体。由此可见，多党合作不仅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保证。

其次，多党合作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人民内部不设置排他性的社会条件，不分财产多寡、不分种族、性别和信仰，保证所有人民都平等地享有民主权利。”^[10]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及人大代表创新形式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体察和收集民情民意并将之上升为党的意志并最终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政府政策；而且需要各民主党派广泛联系群众，在政党协商和政治协商的过程中达成共识，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情民意，成为党和政府有效沟通人民，倾听人民呼声、响应人民诉求的重要渠道。

最后,多党合作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形式之一。“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一系列运行机制将逐渐成熟定型的民主制度贯彻到了党的组织体系、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市场组织体系与社会组织体系之中,表明了它不仅是政治领域的民主,还是经济领域和生活领域的民主,有效地创造出了各个领域的有机团结。”^[11]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既需要制度的保障,更需要保证民主落到实处的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无疑是重要实现形式。多党合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就我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进行政党协商和政治协商的过程,是党通过各民主党派获取不同领域的民意,从全局把握我国的国情、党情和民情,并保证人民群众深度参与各领域的政策、措施的制定、执行和民主监督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22-02-2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5991677440404577&wfr=spider&for=pc>.
- [2] 陈家刚,曲政.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代价值、制度基础与实践空间[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1):10.
- [3][6] 包心鉴.论协商民主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特有功能和制度优势[J].社会科学研究,2022(1):3、4.
- [4] 康杰.以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思想推进多党合作事业新发展[J].攀登,2020(1):31.
- [5] 贾国哲.多党合作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和具体举措[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1):56.
- [7][8][9] 黄天柱.民主党派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与提升空间——以中国政策过程为视角[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1):45、46、52.
- [10][11] 李笑宇.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机制与显著优势[J].科学社会主义,2021(5):121、122.

责任编辑:王天海

(上接第 32 页)

- [3] 崔大树.关于区域现代化基本涵义的理论探讨[J].经济学动态,2002(12):31.
- [5] 刘旺洪.区域现代化界说:从全球实践到中国方案[J].现代经济探讨,2018(9):35.
- [6] 洪银兴.现代化理论和区域率先基本现代化[J].经济学动态,2012(3):8.

- [7] 夏锦文.基本现代化的区域探索:理论阐释与江苏实践[J].现代经济探讨,2019(3):3.
- [8] 李建华,李天峰.省域治理现代化:功能定位、情境描绘和体系建构[J].行政论坛,2021(4):20-21.
- [9] 王树华.完善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J].群众,2022(2):12-13.

责任编辑:蒋建忠

中国特色新型统战智库创新策略研究

吕戎 李刚

摘要:统战智库是统战部门主导或参与的,围绕统战理论与实践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提供高质量思想产品的新型智库。其旨在引导统战对象凝心聚力、服务大局,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战智库的时代价值在于促进统战理论创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高参政议政效能,凝聚统战优势资源。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探索中,一些统战智库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的创新策略,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效。统战智库建设的特色鲜明的体制机制、有效路径可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理论提供参考。

关键词:统战;智库;创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5-00045-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批示,对新型智库的内涵、属性、功能、特征和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作出了科学阐述,为新型智库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建党百年来,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巨大优势和重要法宝,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统战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统一战线新形势新要求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是由党委统战部门牵头主导,吸纳党内外专家学者,以统战理论政策创新、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等统战制度体系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和任务为重要研究内

容,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为根本宗旨的非营利研究咨询机构,是具有统战性质和功能的特殊智库,是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重要智库机构。加强统战智库建设,对于推进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开创新时代统战事业新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一、统战智库的特征、定位与作用

在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统战智库以自身独特的优势、特色和功能定位成为这一体系的重要构成者^[1]。

(一) 统战智库的特征

统战智库具有研究范围的综合性、研究主体的广泛性、呈现类型的多样性三大特征。其研究

收稿日期:2022-07-19

作者简介:吕戎,南京财经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江苏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南京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李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教授。

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在议题设置上能够以更广的视野和思路拓展研究领域；研究主体涵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侨等各界人士，集聚了广泛且强大的智库专家力量；呈现类型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学院智库、民主党派智库、有关高校科研院所智库、各级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等统战系统具有理论研究功能的社会团体及专设机构，以及统战对象自发组织的智库研究机构等。

（二）统战智库的目标定位

统战智库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其核心任务是服务于党委政府决策，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同时促进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具体而言，统战智库是统战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研究基地，需推出尊重智库规律、突出统战特色、符合发展需求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咨询外脑，为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出谋划策，在治国理政中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是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政治参与的有效载体，推进政治参与方式的多样化发展，能够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才智；是反映社会舆情的重要渠道，发挥着弘扬正能量、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是联动汇集统战资源的重要桥梁，有益于广泛凝聚发展合力，促进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统战智库的功能作用

统战智库的根本属性是统战性，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下，汇聚统战才智，发挥统战优势，激发统战活力，彰显统战担当。通过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来出思想、谋战略、解难题，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撑。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提供创新性思想；为统一战线实践活动提供策略性指导；为国家宏观发展提供战略性规划；为具体领域变革提供策略性路径，从而实现统战理论与工作实践的创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参政议政效能的提高、统战优势资源的汇聚。

二、统战智库发展的现实瓶颈

（一）思想认知不充分

统战智库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人对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认识还不是很充分，一些人对于统战智库的概念、特征、定位、功能与作用的界定尚不清晰明确，这些导致智库特色不鲜明、管理运行不规范、人才储备不充足、组织机构不健全。例如，民主党派智库的定位还不够明确，同其他类型智库区分度不强，难以发挥其独特优势。

（二）智库体系不健全

虽然统战智库机构数量不少，但由于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智库建设水平存在差异化现象，且不同智库之间缺乏密切合作，距离高端智库建设目标存在一定差距。定位明确、层级分明、专业多样、联系密切、相对独立的统战智库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构建。

（三）运行机制不规范

统战智库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运行机制，包括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经费保障、项目运作、考核激励、成果推广等机制。统战智库内部虽拥有专业研究队伍，但选拔机制单一，学科背景与知识结构呈现趋同性，在选拔、培养和使用等环节缺乏竞争与活力，缺乏完善的考核激励机制和退出机制。智库机构较为分散，缺乏明确的工作章程和工作规范，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也相对模糊。

（四）成果质量不突出

由于统战智库之间缺乏合作，与海外智库的联系也较松散，所以很难形成有规模、有实力的智库；很多统战智库机构虽拥有专业人才，但其中大多都是兼职人员，这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对智库项目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进而影响了高质量成果的产出。统战智库研究内容相对碎片化，针对性、实效性不够强，部分研究成果阐释性、附加性、宣传性成分居多，自主性、建设性、独立思考的成分较少，推动工作实践的功效有待提升。

（五）社会影响不明显

统战领域举办全国性统战智库论坛或具有智库性质的专题研究论坛较少，与大众传媒互动联系较少，通过微博、微信、学术报告会等平台的宣传力度较小，这些制约了统战智库成果的宣传，进而导致智库品牌形象塑造力不强、社会影响力不足。统战智库很少建有专业的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更谈不上通过网络新媒体进行宣传推广、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其社会影响力、辐射力不高。

三、统战智库创新建设的机制探索

（一）建设原则

坚持突出特色，将社会资源和研究力量相结合。统战智库建设要坚持“突出特色、突出优势、突出重点”，重点建设统战特色智库平台。统战部门要积极与社科联、高校、民主党派、企业、社会组织展开合作，整合社会资源和研究力量，进一步支持统战智库建设。坚持研以致用，将专业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统战智库既要在统战研究领域做好理论创新，也要重视跨学科、跨专业协同创新。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凝练主攻方向，更好地发挥外脑和参谋作用。坚持改革创新，建立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遵循智库发展规律和决策咨询工作规律^[2]，创新统战智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建立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供需沟通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经费投入机制、国际合作机制等，形成并扩大统战智库协作网络。坚持项目推动，保持成果转化良性运转。建设统战智库，必须不断创新研究项目，把项目推动贯穿全过程。项目推动产出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内参、会议和论坛等各类形式成果，将优质成果转化为智库“拳头”产品，形成一个全面、系统、平衡的统战智库品牌有机体。

（二）建设机制

强化统战智库体制机制建设，构建全方位、一体化协调互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是确保智库良性运转的重要制度基础。

第一，建立统战智库组织协调机制。领导协调机构在建设新型智库中担负重要责任，发挥统筹协调功能。省级党委统战部可成立统战智库领导小组，负责智库建设的统筹规划、方针制定、资源整合、沟通协调、国际交流等；牵头智库机构联席会议，研究新情况，寻找新路径，解决新问题；打造“高峰论坛”等统战智库领域特色品牌活动，不断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成立统战智库联盟协会，打造专业培训和智库研究联动新格局，有效提升决策咨询服务水平。该机构包含以下两部分：一是机构领导层采用“党委政府+科研专家+企业”的形式，定期召开学术交流活动，结合国家和省级政策制定统战智库发展计划；二是成立协调性理事会机构，对不同领域或区域的智库进行协调，扫清智库建设发展的障碍^[3]。

第二，健全统战智库管理营运机制。引导统战智库完善体制机制，为管理运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首先，建立专家遴选机制。基于目的性、专业性、规范性原则，完善遴选原则、遴选标准、遴选组织与实施方案等，构建专兼结合、层级有别的专家队伍。其次，建立信息收集、处理机制。明确信息收集原则、路径、方式及内部传递处理程序等，推进信息共享系统建设，提高信息流转的速度和效率。再次，建立研究成果转化机制。省、市统战部门负责所有智库成果的收集汇总，并统筹策划各类别成果的交流转化。智库研究可以以哲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类别作为划分依据，也可以以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作为划分依据，推进智库研究的社会化通力协作，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例如，可结合统一战线相关领域特色，推进“1+1+1”合作共建智库模式，即“一个统战团体组织+一所高校+一个党政部门”的模式。省、市统战部门根据智库研究方向和成果质量有针对性地帮助智库搭建和延伸成果转化平台。最后，建立畅通的互动表达机制和公共传播机制。统战官方智库一般具有较为畅通的“上达”机制和互

动沟通渠道,相比之下,社会智库需要付出更多才能打通渠道。构建并畅通智库专家与政府职能部门信息交流直通车,才能使高水平研究成果直达主要决策者。掌握公共传播规律,利用新媒体、新形式、新方法,结合社会热点话题,对智库阶段性成果、时效性成果进行推广宣传,适当投入互联网流量扶持和话题引导,使统战智库的触角通过网络新媒体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统战内刊、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党派(团体)专刊等现有刊物上开辟各具专业特点的智库专栏,或定期刊载智库成果。定期举办有影响力的高端论坛,反映研究成果,建立与决策机关、媒体和社会的沟通渠道。

第三,强化智库成果认定与激励机制。智库成果是研究人员的智力结晶,也是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落脚点。科学认定智库成果、妥善设计激励机制,既是对智库专家科研劳动的充分肯定,也是推动智库体系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智库成果认定与激励应着重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有效融入现有科研工作认定与激励机制,将智库工作纳入常规科研工作考核内容,作为业绩考核、评奖评优、职称评聘的重要依据。二是激励过程应体现对智库研究综合因素的覆盖与判断,统筹考虑智库成果从立项到评价的过程,针对政府、行业的重点难点,从立项时就设定对高水平成果的激励,并征询承揽单位意见;对受到各级领导批示、不同单位采纳、不同刊物刊载的智库成果予以奖励,并尽量推动与现有学术评价体系的适配(或是科研量化打分中按相应级别成果折算认定);对于获得奖励、具有较大现实意义的优秀智库成果,给予一定金额的后期资助,并鼓励智库机构配套一定资金,用于开展后续决策咨询研究。

第四,落实统战智库经费保障机制。合理安排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推动智库经费管理统筹协调和落地落实,分阶段精细化保障经费的合理管理与长效运营。在智库建设的早期阶段,将专

项建设经费纳入政府的年度预算。按年度落实维持运营经费,以保证日常工作和常态化学术活动。设立用于调研考察、项目推进、宣传推广、成果转化等专项经费,与项目和业绩挂钩。随着统战智库规模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可改变经费来源单一化的模式,逐步构建事业专项经费、社会委托、企业赞助等多元化保障体系,为智库研究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各智库也可以通过承接委托课题、成立基金会或研究成果转化等方式获得研究经费,或利用联合培养、实践实训等活动补充智库经费。

第五,确立统战智库评价考核机制。党委统战部作为主导部门,负责制定出台一套务实完善的绩效考核与评价办法,定期组织开展智库考核。注重智库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目标导向,采用独立评价体系和第三方数据结合的手段,对智库关键信息做“CT扫描”,用量化体系反映“评价指数”,确保考核结果的权威性、严肃性与导向性,尽力做到考准、考实、考客观,考出智库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对业绩突出的智库在经费、课题、荣誉等方面给予支持,对于表现优秀的新智库及时关注支持,通过优胜劣汰、动态调整,促使智库自我加压、不断发展,实现智库绩效与组织绩效的双赢。

第六,搭建统战智库信息平台机制。加强智库信息化、网络化与科学化建设,以大数据思维和信息化手段管理统战智库,切实增强智库产品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坚持开放共享原则,建立智库数据中心及统一开放的智慧平台,打通信息传输“绿色通道”,确保数据信息的及时性、实践性、准确性,借助互联网实现智库服务线上线下的无缝对接。利用数据采集、筛选处理、统一检索、智慧分析和可视化展示等智能化技术手段,对智库项目、课题集中统一规范标准进行合理分类、动态监控,将散落的数据资源进行汇编整理、有效分析,为决策咨询提供精准化、科学化、专业化的服务。

第七，树立统战智库共同体意识。构建统战研究共同体，成立统战智库联盟协会，为统战智库搭建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的交流合作平台，优化合作方式，消除知识和信息壁垒，提升决策咨询服务水平。统战智库联盟协会承担协调组织职能，确立联盟发展方向，全方位、综合性开展研究，为智库建设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推进智库研究与政府决策的良性互动，并以智库合作促进信息沟通、以智库交往带动人文交流。

四、统战智库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拓展统战智库嵌入式服务模式

统战智库作为服务党委政府决策的智囊机构，必须主动嵌入决策咨询体系，通过与党委政府的紧密联系，参与民主协商、社会治理、决策咨询，服务统战理论政策创新与实践创新。嵌入式咨询服务要求统战智库全程嵌入决策咨询体系，发挥党委政府的“外脑”作用。这包括政策制定过程嵌入、决策咨询流程嵌入、决策咨询场景嵌入、政策共同体圈层嵌入等模式。

政策设计制定过程嵌入是指智库的咨政活动要贯穿政策设计制定过程的始终，涵盖顶层设计、议程安排、辩论分析、宣传推广、评估与反馈等多个环节。各类智库普遍重视领导批示，但多数智库对政策执行与评估等环节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此，统战智库要切实做到全程参与，尤其对领导批示要持续关注跟踪，参与该批示的政策协商，直至决策成为文件，并对文件的执行情况与实际效果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估。只有持续关注、跟踪掌握政策设计制定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才能称之为全过程嵌入。

决策咨询流程嵌入是指在调查研究、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等全部流程中，发挥技术支援优势，服务党委、政府内部政策研究机构的工作。对统战智库来说，需要在决策意向初始阶段就主动参与进去，与决策部门共同对相关数据信息加以认真研读、分析梳理、调研论证，这

样才能形成比较客观、准确的咨询报告。这是专业化、智慧化统战智库应当具有的，能够全面深度嵌入决策咨询过程的能力。

决策咨询场景嵌入是指主动参与统战部门的调查研究、咨询问询、座谈交流等活动，增强现场感受，从而全面客观了解决策产生的初因与结果，以免因缺少实际语境对有些重要信息、观点和意见产生误读和误判。因此，统战智库嵌入党委政府决策和人大政协参政议政会议，进行现场调研，这非常必要。

政策共同体圈层嵌入是指统战智库需要有意识维护一些必要的公共关系，包括政府关系、产业关系、媒体关系及学术关系等。统战智库要主动与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良性化的互动沟通。只有深层嵌入，才能消除研究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确保高质量成果的产出。

统战智库提供决策咨询成果和服务，需要有效的信息提交渠道和反馈渠道，也需要决策部门的认同，让统战智库得到“认同感”和“获得感”，以提高智库建言咨政的积极性。省级党委统战部可以主办《建言专报》，定期专门出版统战智库或重点统战智库的内参、研究报告等决策咨询类成果，报送省委、省政府等，为统战智库信息报送提供最为直接畅通的渠道。当领导作出批示或被决策部门采纳时，省委统战部应及时反馈信息，并给予鼓励。

（二）强化统战智库产品建设能力

统战智库落脚点在于“智库”，智库应发挥理论创新、建言咨政、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五大功能，通过智库产品供给，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贡献才智。

一是树立统战智库产品意识。智库优秀产品不仅要靠智库自身的科研实力，还需要有产品意识，规划设计好智库的旗舰产品。统战智库也需要提升产品意识，打造旗舰产品。通过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渠道优势、领域优势，根据自身特色做好产品规划，通过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产

品来提升品牌和声望。

二是做好统战智库产品规划。智库产品的推出要经历“规划、设计、推广”三个阶段。统战智库及智库联盟可以按年度、季度甚至月份召开工作会，商讨制定智库研究成果的输出规划，实现长短线产品相结合，开展协同合作，整合输出资源，提高产品质量。在设计每一项成果时，充分体现用户导向，以目标用户为中心，充分满足决策部门对决策信息的需求；同时要根据智库资源特色和约束条件，合理设计每一项产品。在推广阶段，智库要通过多途径、多维度吸引目标用户，确保产品掷地有声。

三是举办统战智库旗舰活动。开展具有创新性、辐射力的品牌活动是扩大智库知名度的重要路径。从目前情况看，国际知名智库非常重视在研究过程中和成果发布时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共活动，这已成为智库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例如，通过举办论坛、研讨会、成果发布会等活动，吸引公众、媒体及决策部门的关注，有利于智库品牌的宣传推广。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甚至招聘专业队伍负责智库活动的策划、宣传与实施，以期实现有效传播、彰显影响的目的；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承办的中国智库治理论坛在北京、南京轮流举行，逐步成为智库界最有影响力的活动之一。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是发布和展示旗舰产品的平台，其本身也具有较高的品牌价值。统战智库联盟协会和智库自身，都要考虑从特色品牌活动上下功夫，使智库产品及活动为统战智库获得更多关注。

四是打造统战智库明星专家。智库建设要基础扎实、发展状况良好，才能为塑造智库明星专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就统战智库明星专家而言，要熟悉统战工作，具有统战智库的实践经验，能够在智库机构中担负重任。他们不仅要有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而且要有主动经营智库的意识；同时，要有较高的曝光度，在统战领域重要活动

中参与度高，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并乐于通过网络媒体将科学性、前瞻性的决策建议进行广泛传播。

（三）支持统战智库开展对外合作

统战智库最大的优势在于“朋友多”，能够搭建来自各行业、各领域、各民主党派的“朋友圈”。智库要充分发挥优势，采用国际智库政策生产的普遍模式，召开 10—20 人规模的“政产学研媒”跨界政策闭门研讨会，为决策咨询提供概念、观点、思路和方法指导，由各智库课题组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撰写出研究报告；采用多种渠道上报或宣传，将研究报告转化为决策和政策；积极跟踪决策和政策落地，通过培训、案例评选、政策解读和政策评价等形式介入实践。统战智库可通过教育培训，提升统战干部履职尽责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领导能力，以及良好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而提高统战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水平和质量。社会主义学院、高校等统战智库在这个方面具有坚实基础和相当优势，可以提高党外代表人士和干部领导能力为出发点，架起学习与工作的桥梁，完善社会服务机制，增强社会服务本领。统战智库成员可以通过在统战部门任职挂职，开展统战工作实践。统战智库要积极拓宽工作领域，整合工作资源，多途径、多方式开展工作；要广泛联谊交友，注重人文关怀，在热情服务中争取人心、汇聚才智，形成工作合力。这是统战智库发挥纽带作用，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特色方式。

统战智库应加强国际合作，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积极探索与国外智库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智库之间的合作互动机制，搭建智库跨文化交流平台，主办、承办或协办国际学术会议、国际组织活动、国际联合研究项目等，不断扩大智库国际影响力。提升智库专家外语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智库专家队伍。要广交国际朋友，引进知华、友华的外国专家参与智库

建设。

（四）扩大统战智库社会影响力和辐射面

统战智库要利用主流媒体扩大对外宣传。包括电视、报纸在内的主流媒体仍然是理论引领的主要阵地。在权威的主流媒体上发表统战智库成果，能够有效宣传统战工作，引导社会舆论，提高统战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相较于移动互联网的及时性，网站是为较为专业的读者提供完整讯息、展示价值、对外发声的平台，是与外界沟通交流、吸引潜在用户的窗口。网站建设质量与智库形象密切相关，无论是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国际知名智库，还是我国的国家高端智库，普遍建立了内容丰富、版面齐全、功能多样、更新频繁、页面美观的高质量网站。同时，网站定期维护十分重要，不仅要及时发布研究动态、活动情况，更新各类数据信息，还要建立信息审查机制，确保公开发布的所有信息符合有关标准和质量要求。

基于H5和移动端的新媒体平台是5G时代的“流量中心”，统战智库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配合传统媒介及时发出声音，正向引导社会舆论，不断扩大统战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同时，统战智库要始终经营好、发展好、利用好新媒体平台，邀请专业人员协助平台建设，建立稳定的宣传团队，定期更新平台信息，努力提升关注度和阅读量；注重把统战成果、统战工作专业性术语和学术观点转化为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文字，增强

推送文章的可读性，进一步扩大统战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4]，统一战线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对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和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各级党委要把统战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不断提高思想认识，着力创新体制机制，统筹做好统战智库的谋划布局，积极推进智库治理体系、管理体系、研究体系和营运体系建设，切实发挥智库各项功能作用，有效服务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参考文献：

- [1] 李仲才. 统战智库特性研究 [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3): 87.
- [2] 梁健. 科学决策视阈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基于政府-智库-公众三方互动的思考 [J]. 决策咨询, 2020(2): 51.
- [3] 袁焯. 我国智库联盟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J]. 情报探索, 2019(1): 75-76.
- [4] 尤权. 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 [J]. 中国宗教, 2019(11): 9.

责任编辑：吉强

张謇精神的时代价值与传承路径探析

——民营企业对张謇精神的认知与践行

徐春辉 岳文典

摘要:张謇精神是中华传统商业文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和精神财富。践行张謇精神,是民营企业群体回应社会呼唤的应然选择,既受价值观、认知水平影响,也与教育培训、社会氛围等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既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顶层设计、强化阵地建设,又要重视与之相适的良好文化氛围、社会环境、制度保障。

关键词:张謇精神;时代价值;影响因素;传承路径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5-00052-07

一、张謇精神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一) 张謇精神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7 月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他们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张謇以其毕生精力、才智致力于实业教育、社会治理,寻求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之路,为此不惜筚路蓝缕、“舍身饲虎”、百折不挠、开拓创新,留下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遗产,值得后人深入学习与借鉴^[1]。

张謇发扬了一种精神,即将中国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族兴亡和黎民疾苦、崇尚经世

致用等优良传统,与西方工业文明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相结合的新型中国企业家精神^[2]。张謇是受中国传统教育熏陶的人,一样可以有世界的眼光,能达到世界的水准。因此,从本质上讲,张謇精神是中华传统商业文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和精神财富,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兼具世界眼光的开放品格,是贯通家国情怀与经济理性,实现了义与利、公与私、家与国等相互关系伦理重塑的新时代商业文明表征,展示出一种超越性、引领性和全球性的意义。

(二) 张謇精神的时代价值

在新时代,民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收稿日期:2022-08-23

作者简介:徐春辉,中共南通市委党校副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党的创新理论、意识形态;岳文典,中共南通市委党校讲师、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传统文化。

是担当社会责任、弘扬社会美德、促进社会文明的重要力量。践行张謇精神，是民营企业家群体回应社会呼唤的应然选择。

1. 实业报国的爱国情怀，是当代企业家增强民族复兴使命感的动力源泉

爱国是贯穿张謇一生的主线。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国家面临外强加剧入侵之际，张謇以“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爱国情怀^[3]，最终选择以身许国，持之以恒探求实业报国之路。在他看来，“富非实业不张”^[4]，救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办好以工业为主体的实业。张謇经过5年艰辛努力，于1899年成功创办大生纱厂，经过10年艰苦奋斗让“中国最早、最大的现代化垦牧区终于初显风貌”^[5]。张謇的强国志愿并未满足于此，之后，他又“开始搞集各项事业为一体、资金链和产业链相互配套联动的现代产业集群”^[6]，为中国近代民族纺织业、近代民族工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民营企业家要以浓厚的爱国情怀和实际行动，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和使命。学习张謇实业报国的爱国情怀，可以让更多企业家增强民族复兴责任感，使其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提升境界与视野，提高自身站位与企业定位，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2. 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是当代企业家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张謇怀揣“建设一新世界雏形”的崇高理想^[7]，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一方面，他注重技术创新，积极引进欧美各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并通过改良、仿制实现技术本土化创新。为摆脱对西方技术人员的依赖，张謇又积极培养本土技术人才。为此，他从1905年创办第一所实业公立艺徒预教学校开始，先后又创办了通州师范职业科、法政讲习所、手工传习所、农业学校等40余所学校，为实业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技术骨干。

张謇鲜明的创新品格，对当代企业家全面立足国内国际经济大环境，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

推动现代化创新驱动，以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打破西方封锁、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强国富民的社会责任，是当代企业家践行共同富裕发展理念的基本遵循

张謇一生以义为先、以义为主，“时而忧国计，时而忧民生”^[8]，终其一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大利”而奋斗。从创办纱厂初期分文未取，到盈利后创办一系列涉及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利国利民企业，张謇大力兴办各类现代化社会公共事业、社会保障体系。张謇在竭力把实业做大做强的时候，更是“将经营实业所得的股息、红利及公费几乎全部用于公益民生事业”^[9]，为改善民众生活、全面促进南通经济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营企业，追求利润的目标必须通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实现。学习张謇“兼济天下苍生”的民本意识和倾心倾力于社会建设的卓越创举，有助于引导民营企业家提升共建共享、服务社会治理的价值自觉，汇聚践行共同富裕的强大社会合力。

4. 言信守诺的诚信品格，是当代企业家引领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价值基础

张謇始终坚守诚信为本，固守“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10]。他不仅把诚信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基本道德规范，而且始终不忘将为人诚信与校规校训、企业信用联系在一起。在创办学校时，他拟定“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忠信笃敬”等校训^[11]；在经营企业中，张謇的信用意识、契约精神在企业内部，在企业与企业、与消费者、与银行、与社会等方面贯通。他对内注重员工诚信，对外注重产品质量、品牌形象和企业信誉。

张謇深知履行契约、忠诚守信、以德兴商的重要性，并认为“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

知苟得之财，纵能逃法律上之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12]。学习张謇精神，对于塑造秉持法治意识、契约精神、诚信品格的民营经济人士，促其引领经济社会保持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 洞察大势的开放胸襟，是当代企业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要求

张謇主张，“一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在经营好南通各项事业的同时，张謇并没有满足于现状，相反，他把目光投向了江苏乃至世界。

国家鼓励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号召企业家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这要求企业家拥有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博大胸怀。强烈的家国情怀、前瞻的世界眼光、开放的胸襟气魄，是张謇精神的重要内涵，对于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民营企业家对张謇精神的认知及践行现状

2021年7月—9月，课题组以民营企业家对张謇精神的认知及践行状况为主题，以张謇企业家学院参训学员和全省13个设区市部分民营企业家为对象，采取问卷调查和集中座谈的方式开展了专题调研。

（一）被调研民营企业队伍的基本情况

从年龄结构看，以35—45岁中青年企业家为主，其中70后企业家占34.21%；80后、90后企业家占47.83%。从知识水平看，文化程度普遍较高，58.61%的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21.01%的人有过海外留学访学或进修工作经历。从政治面貌看，群众占41.12%，中共党员占39.00%，民主党派成员占6.91%，无党派人士占12.97%。从企业家所属企业创立的时间和年销售额看，大部分是处于创业期或成长期的中小微企业。

其中，创办10年以内的占40.22%，10—20年的占38.00%，20年以上的占21.78%；年销售额1000万以下的占43.70%，1000万至1亿的占34.79%。从所属行业看，37.32%民营企业家来自制造业，占比最高；其次为批发和零售，占比为12.56%。

（二）民营企业家传承张謇精神的现状及问题

调研发现，民营企业家对企业家精神越来越认同，很多企业家都在默默地为自己的家乡和祖国贡献一分力量。但是，总体而言，部分民营企业家对张謇精神的理解仍停留在浅表层面，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还缺乏深刻认知。

1. 对“爱国情怀”有较高认同，但缺乏以国家和人民福祉为重的使命感

爱国主义是张謇精神的核心要义。访谈中，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爱国情感强烈，高度认可党和政府关于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5级量表评分结果显示，“我为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而感到自豪”的均值为4.85分，“民营企业家要听党的话，为大众服务”的均值为4.79分，这表明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家能够坚定爱国情怀。

然而，两组统计数据显示，也有一部分人还达不到把办好一流企业同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紧密结合的高度。一是在创办和经营企业的目的上，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实现自我价值”（62.31%）、“改善家人生活”（43.65%）、“赚钱”（30.09%）；“产业报国、产业强国”仅占25.08%。二是关于创新的主要动力，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企业生存”（49.12%）、“市场竞争”（39.54%）、“实现自我价值”（39.22%）；相比之下，“为国争光、为国分忧”仅占13.56%。可见，在创业创新发展上，部分民营企业家的站位还不高，把企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上升到推动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高度还不够，创新创业的目标定位仍有待提升。

2. 履行社会责任的效度不高，缺乏针对性、主动性和长效性

社会责任是张謇精神的标志性特质。自斯密以来，近现代经济学普遍阐发了功利与美德相统一的商业思想。数据显示，75.66%的企业家认为，有义务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认为完全没有义务履行社会责任的仅占2.66%。可见，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越来越认同，初步养成了“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

但是，调研也发现，当前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整体效度还不高，在引领共同富裕上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参与形式单一，针对性不强。从企业参与公益的方式看，71.44%的企业家选择以“慈善捐赠”的形式参与公益活动。结合企业规模、行业领域参与“乡村振兴、产业帮扶”（27.43%）、“结对帮扶”（38.05%）、“生态环境保护”（16.99%）的企业，占比相对较小。

履行社会责任的主动性不足。数据显示，45.46%的企业家是响应“政府和有关组织的号召”和“政策引导”而参加社会公益，26.62%的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是为了“树立企业良好形象”，16.13%的企业家是“向身边优秀榜样学习”，2.94%的企业家是为了“满足公众对企业的期待”，还有1.04%的企业家仅仅是随大流。调研发现，也有少数企业家认为履行社会责任是负担，或是把履行社会责任异化为“作秀”，偏离了服务社会的初心。

社会责任行为缺乏长效性。数据显示，65.84%企业没有专门的社会责任或公益慈善部门，能把社会公益活动上升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仅占16.37%。访谈中，有的企业家反映民企发展时间相对较短，不能认清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尚未把社会责任嵌入制度文化和发展基因之中，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还比较随意，缺乏与企业发展同步规划的长远考量。

3. 创新发展主动性不足，创新创业信心有待强化

熊彼特率先提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鼓励并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但是，调研数据显示，69.87%的企业近三年研发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平均低于5.00%，其中39.99%的企业不足3.00%。不少企业家心态比较浮躁，忙于“挣大钱”“挣快钱”，缺乏艰苦奋斗、精耕细作的耐心和恒心。

从企业家反映的创新阻力看，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缺少技术和研发人才”（61.07%）、“缺少资金”（50.77%）、“政策支持不到位”（31.14%）。此外，25.63%的企业家认为“风险大，不敢轻易尝试”。访谈中，多数民营企业家，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家表示，不是主观不愿创新，主要是社会创新环境支撑不足，对创新缺乏长远预期。

除此之外，调研也发现，尽管党中央一再宣示，对民营经济的大政方针不会变也不能变，但仍有部分受访者在内心里存在“国进民退”的担忧，这影响了企业家创新创业信心。

4. 诚信法治意识明显提升，诚信体系仍需健全完善

诚信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保障，也是促进市场主体合作共赢的底层逻辑。当前，大多数企业对合法诚信经营有较高认同度，对法治环境也有较高期待与关注，诚信和法治意识明显提升。在关于保障企业生产经营、保护合法财产方式的问卷中，“诚信合法经营”和“依靠法律”成为民营企业家的首选，占比分别为74.61%、63.73%。

但调研也发现，整体法治水平和诚信体系仍需健全完善。访谈中，有企业家表示，一些大企业在失信方面推波助澜，恃强凌弱。还有少数政府工作人员缺乏带头遵守诚信的观念和意识，造成失信者得利、诚信者受损的情况，产生负面效应。

5. 不少规模以上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国际视野有待开拓

多数民营企业具备全球化意识，有意参与国际市场。但调研发现，不少规模以上企业缺乏拳头产品，在推进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集合创新能力及产品科技含量方面意识不强、力度不够。

“缺少核心竞争力”（44.41%）、“创新能力不足”（32.93%）、“缺乏国际性复合人才”（29.39%）等因素制约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访谈中，一些企业家表示，对国际市场规则、需求、动向不了解，对国际形势、国际政治关注较少。

三、影响民营企业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的因素

民营企业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既受自身价值观、认知水平影响，也与教育培训、社会氛围等外部成长环境密切相关。结合调研和访谈情况，课题组认为，当前影响民营企业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党和政府服务管理层面看，主要存在三个影响因素

1. 教育培训制度不健全

在教育培训方面，企业家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是：“建立长效培育机制”（53.19%）、“整合培训平台，明确各自定位”（53.05%）、“培训内容精准化”（43.91%）。目前，民营企业家的教育培训还缺乏统筹规划，各层级、各部门的培训分工还不够明确，存在培训对象、主题和形式相互冲突的现象。培训形式比较单一，高质量培训相对较少。社会层面的商业化培训在引导企业家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方面，作用发挥不明显。

2. 激励引导体系有待完善

在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方面，由于激励标准、方法、措施尚不完善，清晰明确的“张謇式”企业家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形成，在政治任用、选树标杆、表彰惠企等激励措施方面，“张謇式”企业家导向还不够突出。调研发现，各地激励措施往

往偏重大型企业，一些中小微企业获得感和归属感不强。

3. 服务保障机制有待强化

目前，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慈善公益的服务对接机制还不健全，慈善公益、信托等相关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统筹安排、常态化、平台化的慈善公益活动较少。调研中，一些民营企业需要参与慈善捐赠的收集、转移和分配等各个环节，慈善公益成本相对较高且可持续性差。在支持保障企业家弘扬张謇精神方面，还缺乏更加有效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另外，保障民营企业权益的各项法律和政策尚未得到充分有效落实，这清晰地体现在企业家的担忧中。例如，企业家主要担忧的问题前三项依次是：“发展环境不公”（51.53%）、“财产权和创新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44.36%）、“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会变”（43.23%）。

（二）从企业家自身层面看，主要有两个影响因素

1. 受多元价值思潮挑战，部分企业家对集体主义、社会责任等价值观的认同趋于弱化

全球化发展中多元价值思潮并存，伴随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与蔓延，民营企业家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出现多样化与差异性。部分企业家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富裕”缺乏深度认同，在涉及具体利益时，很多企业家处理不好个体发展与政治大局、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调研中，个别企业家认为，自己先富起来主要依靠个人努力和自身聪明才智，与政府、社会等外在因素没有多少关联，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让企业牺牲利润，甚至是“劫富济贫”“养懒汉”。

2. 企业家的综合素养、社会认知、政策解读能力有待提升

因综合素养和知识水平的差异，一些企业家对转型升级中的国家大政方针，如“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等，缺乏正确认知，这需要有效引导。还有一些功成名就的大企业家和有海外留

学经历的年轻一代企业家对国情、社情、民情了解不深，对民营经济领域的一些政策和管理举措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甚至误读、误解。

(三) 从社会层面看，有两个方面影响因素

1. 媒体聚焦度不足、覆盖面不广，鼓励张謇精神的社会氛围有待优化

目前，虽然新闻媒体全方位立体式地对张謇进行宣传，但没能聚集张謇精神。从覆盖面上看，张謇精神的宣传目前主要以江苏为主，全国的媒体关注度不够高，鼓励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营造得还不够。

2. 对张謇精神思想渊源、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目前，对张謇精神的思想渊源、文化内涵缺乏深入研究，源头性资源挖掘不足、深层次认知不够，尚不能从中华商道和新时代商业文明的高度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因此，难以从思想根源上引起企业家的共鸣。

四、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的路径与对策

结合上述分析，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大力培育新时代“张謇式”企业家群体，既要激发引导企业家的内驱力，也急需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给予更多统筹规划与制度保障。

(一)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民营经济人士培训体系

完善培训规划。以培养新时代“张謇式”企业家为目标，加快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推动民营企业家教育培训工作步入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轨道。将“张謇式”企业家队伍建设纳入国家人才队伍建设发展战略和民营企业家教育培养工作总体规划，完善中长期培育发展计划，研究出台培育政策意见，设立专项培育基金，切实加大对民营经济人士的培育力度。

增强培育合力。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培育“张謇式”企业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强化全局观念，充分整合相关各方资源和力量，形成培育合力。要优化整合现有企业家培育资源，明确统战部门、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商会、企业、

高校、研究机构等多元培育主体的作用机制，加强分类指导，突出培育重点与中心任务，建立统筹协调、相互衔接的培育平台体系，避免简单重复。

建立轮训机制。构建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培育“张謇式”企业家的调训、轮训工作机制，实现对领军型、科技型、成长型、新生代等各类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分层级、分行业、多元化、梯队式培训。对担任县级及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和工商联所属商会副会长及以上职务的民营企业家，建立年度培训计划，确保他们在一届任期内至少参加一次培训。

(二) 加强基地建设，打造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学院

充分发挥张謇企业家学院培育主阵地作用。充分发挥张謇企业家学院的独特优势，高起点打造面向全国“张謇式”企业家高端教育培训基地，全方位推动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持续发挥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全国工商联、江苏省委统战部、南通市委市政府等参加的高质量建设发展协调小组的作用，把建强建优张謇企业家学院摆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定期组织召开高质量发展推进会，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协调解决重大建设发展问题。相关部门要建立目标责任管理机制，明确职责分工，为学院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持续探索与高校、科研院所、知名商学院等共建共享共赢的创新合作模式，共同推进“张謇式”企业家教育培训工作创新发展。科学规划教育培训，寻找适合中小企业行业特性的培训方式，创设相应的平台和抓手。

明确培训要求。构建张謇式企业家调训、轮训工作机制，实现对领军型、科技型、成长型、新生代等各类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分层级、分行业、多元化、梯队式培育。

(三) 强化文化认同，发掘张謇精神的文化资源

张謇精神是中国文化孕育的产物，儒家文化

是其思想根源。发挥文化影响力、塑造力的本源作用，是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的关键举措。

建议加快组建张謇精神研究联盟，深入研究张謇精神形成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内生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系统总结和整理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特质和中国式经营管理理念，进行理论创新，为确立新时代商业文明体系奠定基础；着力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育，挖掘传统文化中有益于爱国情怀、责任担当的养分，有的放矢，发挥文化育人、文化引导的功能；充分发挥国际儒联优势，调动其海内外学术资源，系统阐述张謇精神文化内涵，构筑民营企业内生精神资源。

（四）优化培育环境，构建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生态

强化法律保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为企业家精神的萌生、发育和壮大提供支持。要以公平为核心原则，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依法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建立法律的预期性宽容机制，严厉查处侵犯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各种违法行为，为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持续构建公平公正竞争的法治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升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信心，让企业家有明确发展预期。

推进政策落地。加大对政策贯彻执行的细则指导和法律约束，积极推进各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落地。数据显示，42.28%的企业家近三年从未参与过重大政策的讨论或制定，46.14%的企业家偶尔参与过。建议规范重大经济政策出台前向企业家问计求策程序，建立参与涉企政策制定企业家咨询库，高度集成匹配相关惠企政策、科创政策。加强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或发布官方APP，建立健全统一、高效、权威的政策信息发布

平台。

优化舆论环境。充分发挥主流媒体、新媒体宣传导向作用，精准阐释张謇精神的时代价值、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倡导创新创业、守法经营、诚实劳动、互帮互助的社会主义道德。加强对优秀企业家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的宣传报道，展示优秀企业家风采，凝聚崇尚创新创业的正能量，营造鼓励企业家创新、发挥企业家作用、尊重企业家价值的舆论氛围。增进大众认知，肯定企业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建议设立全国企业家日，营造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服务企业家的社会氛围。重视网络舆论阵地建设，及时了解和回应社会上涉及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的舆情，为“两个健康”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 [1][4][7][11] 李明勋，尤世玮. 张謇全集：第4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12：550、67、183、444-445.
- [2] 虞和平. 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M]. 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160.
- [3] 李明勋，尤世玮. 张謇全集：第8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66.
- [5][6][9] 罗一民. 开路先锋：张謇[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34、35、113.
- [8] 李明勋，尤世玮. 张謇全集：第1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479.
- [10] 李明勋，尤世玮. 张謇全集：第3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522.
- [12] 王敦琴. 张謇研究精讲[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268-269.

责任编辑：蒋建忠

身份约束、动机驱动或寻求资本： 企业家缘何政治参与

秦泉童 王永香 任思琪 吴高鹏

摘要:政治参与对民营企业发挥企业家精神,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亲清政商关系理念的提出,企业家在政治参与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本研究基于现有文献,构建出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三位一体的影响理论模型,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和组态效应,从企业家的主体视角厘清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对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资本是其核心条件,即只要存在较强的社会资本,无论是否具有政治身份和亲社会动机,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意愿会更强。本研究探讨了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归因,为相关部门建设多元化政企互动渠道、促进企业家参与政企互动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建议。

关键词:政治参与;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社会资本;混合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5-00059-12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创业就业、政府职能转变、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开拓的主力军。民营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关于社会经济建设的议题中,政企互动一直是学界热议的主题。从市场驱动的视角看,政企关系对地方治理具有重要影响,政企互动则是影响

政府政策过程的重要方式^[1]。

20世纪80年代,私营经济受到严格的限制,企业家的政治属性很模糊;90年代后,企业家的政治地位上升,开始被视为政治吸纳的对象;21世纪以来,党关于政企互动的执政理念发生较大变化,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迎来更加积极的对企业的政治整合^[2]。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新型

收稿日期:2022-08-14

作者简介:秦泉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参与和行为公共管理;王永香,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实践、民主政治;任思琪,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吴高鹏,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推进路径研究”(17CZZ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政商关系的治国理政方针。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弘扬企业家精神。这意味着党和政府再次肯定了企业家在政企互动中的“自己人”地位。因此,理应从企业家的主体视角来讨论政企互动这一主题。

政企互动是指企业通过与政府发生联系并实现双方资源交换的过程^[3]。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视角来看,政企互动分为两个层面: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和中央政府与企业的互动^[4]。两个层面都具有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政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寻求帮助等多种政治互动形式^{[5][6][7][8]}。

本研究主要关注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即“企业家努力通过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等达到与政府官员结识,从而得到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的行为^[9]。将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检验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和社会资本对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首先,从现有文献中提炼出政治身份,社会资本与参政动机影响政企互动的理论假设;其次,通过问卷调查获得量化数据,检验政治身份、社会资本和亲社会动机与政治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再次,就深度访谈资料,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进一步检验自变量的组态效应;最后,从企业家视角剖析他们政治参与意愿的发生逻辑与机制。

一、文献综述

目前,大多数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从四个视角进行,分别是政府主体视角、政企互动视角、量化视角和行为策略视角。

第一个视角的研究将政府部门视为研究主体,遵循政府是政治参与的主导者和干预者的研究思路,政企互动的产生是为了弥补政府在部分业务中的短板。Feng等认为,当企业家试图与地

方政府建立起联系时,需要政府发出邀请,企业家才被纳入政治参与体系当中^[10]。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不仅能促进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还体现着国家制度对社会主体多元利益的兼容性程度(能否兼顾更多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同时,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也有利于帮助政府更加深入了解市场运作逻辑,合理调控市场资源配置^[11]。周黎安认为,政企合作的性质与效果受制于政府内部激励,由于激烈的地方政府辖区竞争,地方政府会干预企业行为,强化政企合作的倾向^[12]。政企合作是政府深度干预的政企关系类型,政府通过购买需求、提供资源支持、税收补贴、加入股份、政策法规保障等方式助力企业发展^[13]。地方政府通常通过地方经济和创新政策、奖励制度,引导企业加强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从而推动属地的企业发展^[14]。

第二个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企业家扮演的角色和进入政企互动的方式。阳春花、庞绍堂认为,企业家通过嵌入到政商关系网络中进行政治参与,根据企业家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企业参与自主性和企业外部性,构建出关系型嵌入、身份型嵌入、组织型嵌入、公益型嵌入和资本型嵌入参与模式^[15]。根据自身对政策的重视和依赖程度,企业家通过迎合政绩、坐地要价、利益疏通、借力施压与正式沟通五种方式参与政治生活^[16];李娉和杨宏山将地方政企互动划分为“企业-地方”和“联盟-地方”两种类型,其中“企业-地方”案例(深圳劳动合同制改革)就呈现了企业用投诉的方式施压地方政府推动制度改革的过程^[17]。

第三个视角的研究主要探讨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此类研究具有明显的量化色彩。企业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面子思想和长期发展的思维促进了企业家的政治参与^[18];女性、年轻及文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家政治效能感更高,政治参与行为更多^[19]。

第四个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参与过程的

企业家的行为策略选择。马丽波、路文静运用博弈论分别分析了同时博弈和序贯博弈下的差别/无差别政策对企业家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指出无论基于哪种博弈形式,企业家都会在有差别政策的条件下寻求政治参与^[20]。同样是以博弈理论为基础,王永香、李忠鹏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引领下企业家与政府互动的选择与收益心理^[21]。企业家还把“交换”视为政治参与的基本线索,通过交换机制获得政治容纳、政策优惠、避免伤害等利益^[22]。例如,企业家为了推广自身的产品而嵌入到政府举办的活动中去(如合作开展官员培训班)^[23]。

以上研究对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理论、模式、影响因素和策略选择进行了充分探讨。然而,第一个视角的研究并未关注到政治参与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忽略了企业家作为政治参与直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第二个视角的研究仅仅讨论了政治参与的运行模式,却忽略了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第三个视角的研究能够探寻出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其一般规律,却无法更进一步解决哪些影响因素影响力大小的问题;第四个视角的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关注到企业家的行为选择策略,但很多研究陷入了非获利即背叛的二元博弈陷阱。从整体上看,关注企业或企业家的政治行为决策层面的研究较少。更重要的是,以往关于中国政企关系的理论先验性假设则是“大政府、小市场”,政府政策主导着市场发展,在此基础上,企业家的政治参与需要政府引导和刺激。然而,近年有研究显示,在企业家的政治活动中,政府与企业家的作用是相互的,且处于博弈当中^[24]。当政府邀请部分企业家进行政治参与时,他们并不一定进行互动,也可能出现推诿和拒绝的消极态度,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企业家会拒绝政治参与,又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政治参与呢?

本研究将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量化-质性顺序设计,进一步挖掘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先通过文献梳理,从理论上提出影响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再通过问卷调查的量化数据进行检验,接着利用深度访谈资料进行补充论证。这种混合设计可以通过量化数据挖掘出一般规律,再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去解释量化数据分析形成的结果,规避单一研究方法或视角带来的分析偏差,从而帮助研究者对调查结论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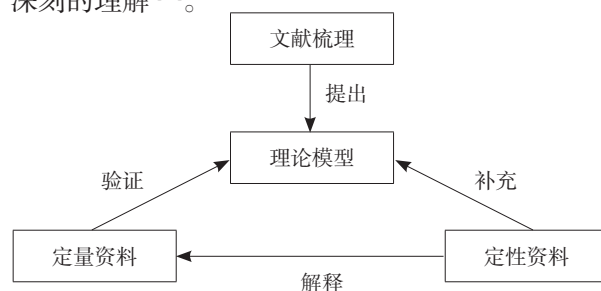


图1 量化-质性顺序设计

二、身份、动机和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意愿

(一) 理论假设

根据基于身份的动机模型(identity-based motivation),在拥有多身份的情况下,个体希望行为与在情境中激活的身份一致^[26]。如果没有政治身份,企业家只需要关注在市场交换中的收益,维持自身企业发展,与公共利益和政治生活有着较远的距离。当企业家获得政治身份之后,就会在激活政治身份的活动中,从事符合政治身份的行为。一方面,政治身份本身就关联着政策的决策,也赋予了企业家影响政策资源分配的途径。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更容易通过政治身份带来的正式渠道接触到政府部门和官员,减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政治参与优势^[27]。另一方面,拥有政治身份代表着拥有增进社会利益,造福一方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会促使企业家进入到政企互动中。政治身份激发了企业家基于身份的责任感,具有进行政治参与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又为企业家提供了法定的路径进入政治参与的议程中,因此提出:H1.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可能更愿意进行政治参与。

除了政治身份带来的责任感，企业家本身就具有增进社会福祉的特殊动机，这种动机被称为亲社会动机。亲社会动机是指保护和提高其他人的幸福的愿望^[28]。一方面，拥有亲社会动机的企业家更会驱动自己去发挥企业的社会功能^[29]；另一方面，McMullen 和 Bergman Jr 指出，亲社会动机诱发的企业家行为并不是追求股东利益和金钱回报，而是希望有资格获得社会情感的回报，进而引起心理的满足^[30]。而政治参与代表了企业家行为的社会属性，就意味着企业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增益社会福祉。研究表明，相当部分的企业家进行政治参与的目的，是唤醒社会成员对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关注^[31]。由此可见，企业家拥有越多的亲社会动机，越会进行政治参与，因此提出：H2. 具有更高亲社会动机的企业家更愿意进行政治参与。

企业家能否真正实现政治参与，除了自身的参与动机之外，还需要参与路径和渠道。在现实中，凭借社会资本实现政治参与是大多数企业家的首选之策。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指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这些关系获取权利、金钱、信息等利益的能力^[32]。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是指，“以企业家个体依附为主要特征，以企业家个体为中心结点的网络体、社会声望和信任的总和”^[33]。地方民营企业的发展通常受到当地的制度环境和政府关系的影响，且企业家通常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如企业会聘用退休的官员到企业任职^[34]。因此，与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良好关系可能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企业家拥有更多社会资本，意味着与政府部门建立了更为深厚的信任和互惠互利关系，并由此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比如当企业家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其更容易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和获得政府补贴^[35]。由于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为企业家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源，企业家会出于强化社会资本的目的去进行政治参与。例如，加入工商联和半官方性质的商会，能够结识政府官员。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与政府信任关系加强的同时，企业家也为自己带来了更多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例如，他们更容易受到政府官员的关注，并被邀请参与政府的活动。同时，他们的社会资本也是自身影响力的体现，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企业家的意见也更容易被政府接受和认可。由上提出：H3. 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企业家会更愿意进行政治参与。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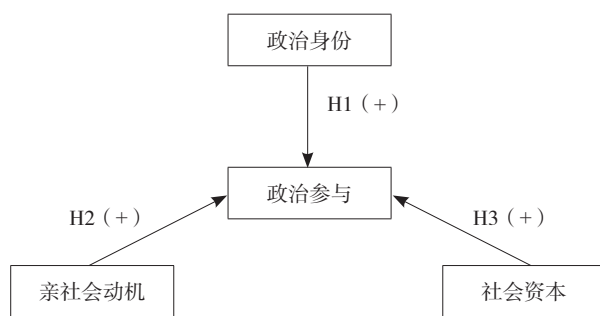


图 2 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影响机制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于 2020 年 6 月到 8 月展开。利用匿名的网络问卷和线下纸质问卷开展调查，并通过民营企业培训会、商会活动等途径发放问卷。共搜集问卷 250 份，剔除未完全填答的问卷后，有效问卷达 247 份。调查对象来自陕西省的西安、榆林和汉中三市，涵盖了关中、陕北以及陕南地区。第二阶段的数据收集将在质性资料分析阶段阐述。

（三）变量及测量

政治参与意愿。用 1 个题项“您有多大程度愿意进行参政议政”来测量（1=非常不愿意，5=非常愿意）。

政治身份。参照胡旭阳的研究^[36]，将政治身份视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用一个题项“是否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测量（0=否，1=是）。

亲社会动机。用利他性质的政治参与目的来代表企业家的亲社会动机，共 3 道题，分别为“政

治参与是否为企业家说话”“政治参与是否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参与是否为社会发展尽力”(0=否,1=是),将这3个变量分别命名为亲阶层动机、亲政治动机、亲经济动机。

社会资本。在企业家的社会资本网络中,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是提供稀缺资源的主体。因此,本研究的企业家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企业家个体与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人际关系,用1个题项“与政府官员交朋友的频率”来测量(1=无,5=总是)。

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学历、政治面貌、企业规模。为了避免存在样本同质性偏差,将政治面貌编码成1个二分变量。中共党员与民主党派人士归类到有政治面貌,群众则视为无政治面貌。

(四) 结果分析

使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测量的共同方法偏差,通过基于主成分提取的因子分析,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2个,且最大因子的方差变异解释率为30.4%,小于下限值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政治身份($r=0.223, p<0.001$)、社会资本($r=0.312, p<0.001$)、亲阶层动机($r=0.150, p<0.05$)、亲政治动机($r=0.165, p<0.01$)、亲经济动机($r=0.132, p<0.05$)与政治参与意愿均显著正相关。

政治身份作为自变量,政治身份与政治参与意愿显著正向关联($\beta=0.435, p<0.01$),结果见模型1。只放入亲社会动机作为自变量,亲阶层动机($\beta=0.250, 0.05<p<0.1$)和亲政治动机($\beta=0.239, 0.05<p<0.1$)对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边缘显著,亲经济动机对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eta=0.282, p<0.01$),结果见模型2。只放入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意愿显著正向关联($\beta=0.237, p<0.001$),结果见模型3。可见,3个自变量分别对政治参与意愿显著的正向影响,H1、H2、H3在这种条件下得到验证。

接着,在模型1的基础上,仅加入亲社会动机作为自变量,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意愿仍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0.510, p<0.01$),亲阶层动机($\beta=0.259, 0.05<p<0.1$)与亲政治动机($\beta=0.257, 0.5<p<0.1$)对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边缘显著,亲经济动机对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beta=0.366, p<0.05$),结果见模型4。可见,只考虑具有政治身份和亲社会动机时,政治身份和亲社会动机对政治参与意愿同时发挥作用。

然而,当加入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beta=0.209, p<0.001$),结果见模型5。可见,当政治身份与社会资本同时存在时,社会资本掩盖了政治身份的影响。

表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5
政治身份	0.21	0.410	—				
社会资本	2.59	1.208	0.377***	—			
亲阶层动机	0.28	0.478	0.042	0.045	—		
亲政治动机	0.31	0.463	0.072	0.169**	0.181**	—	
亲经济动机	0.71	0.454	-0.127	-0.043	-0.078	-0.027	—
政治参与意愿	3.98	1.032	0.223***	0.312***	0.150*	0.165**	0.132*

注: n=247, *p<0.05, **p<0.01, ***p<0.001。

通过多重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由表2可知,控制性别、年龄、学历等变量后,只放入

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结果见模型6。亲阶层动机($\beta=0.252, p<0.05$)

与亲经济动机 ($\beta=0.309, p<0.05$) 对政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亲政治动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eta=0.232, p<0.001$)。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 同时加入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 结果见模型 7。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边缘显著 ($\beta=0.299, 0.05<p<0.1$), 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意愿仍显著正向关联 ($\beta=0.191, p<0.001$), 亲阶层动机与政治参与意愿正向关联边缘显著 ($\beta=0.26, 0.05<p<0.1$), 亲政治动机与政治参与意愿正向关联不显著, 亲经济动机与政治参与意愿显著正向关联 ($\beta=0.357, p<0.05$)。说明当 3 个变量同时存在时, 政治身份的作用被削弱。

回归结果显示, 无论在哪个模型中, 社会资本和亲社会动机 (亲经济动机) 的影响始终显著, H2、H3 得到验证。在未加入社会资本模型里, 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然而, 在加入社会资本的模型中, 政治身份的影响变得边缘显著, H1 不被支持。这意味着, 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意愿的关联干扰了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 3 个自变量可能互有关联, 企业家在获得了政治身份之后, 同时更可能获得政治身份关联的社会资本, 而亲社会动机驱动企业家产生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 这有助于引起政府对企业家的关注, 从而有利于获得政治身份。可能的解释是, 政治身份赋予了企业家进入政企互动的准入资格, 同时也使得政治参与变成企业家不得不履行的义务。拥有政治身份之后, 企业家需要额外承担政治责任, 还可能要面临经济上的损失^[37], 因此, 拥有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意愿的作用可能不如亲社会动机和社会资本两个因素的作用明显。对于大部分企业家来说, 一方面, 进行政治参与或者政企合作, 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心中的企业家精神, 回报社会, 这种追求高层次

表 2 层次回归模型

	M1	M2	M3	M4	M5	M6	M7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性别	0.026 (0.142)	-0.033 (0.136)	0.098 (0.132)	-0.030 (0.140)	0.077 (0.139)	0.052 (0.132)	0.036 (0.794)
年龄	-0.008 (0.091)	-0.006 (0.086)	0.008 (0.083)	-0.045 (0.092)	0.008 (0.139)	-0.016 (0.083)	-0.034 (0.705)
学历	0.032 (0.069)	0.031 (0.066)	-0.016 (0.065)	0.036 (0.068)	-0.012 (0.068)	-0.018 (0.065)	-0.015 (0.822)
政治面貌	0.243 (0.149)	0.303* (0.140)	0.224+ (0.135)	0.185 (0.149)	0.208 (0.146)	0.214 (0.135)	0.164 (0.258)
企业规模	0.13* (0.061)	0.107 (0.059)	0.131* (0.056)	0.103+ (0.061)	0.122* (0.059)	0.109+ (0.056)	0.105+ (0.075)
政治身份	0.435** (0.168)			0.510** (0.169)	0.216 (0.175)		0.299+ (0.089)
亲阶层动机		0.250+ (0.063)		0.259+ (0.137)		0.252* (0.127)	0.26+ (0.051)
亲政治动机		0.239+ (0.139)		0.257+ (0.142)		0.139 (0.133)	0.167 (0.23)
亲经济动机		0.282* (0.142)		0.366* (0.147)		0.309* (0.135)	0.357* (0.013)
社会资本			0.237*** (0.053)		0.209*** (0.059)	0.232*** (0.053)	0.191*** (0.059)
F	3.393***	3.153**	5.903***	3.909***	4.848***	5.153***	4.716***
R ²	0.085	0.098	0.131	0.138	0.134	0.169	0.179

注: $n=247, +0.05 < 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

需求的目标是中国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和亲社会动机的体现^[38]；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特别是人际关系）为企业家提供了多样化的政企互动路径。所以，亲社会动机越强，社会资本越丰富，企业家才越有可能进入政企互动。

另外，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和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意愿的预测也并非完全线性，而很有可能呈现一种条件组合的形式，即存在某一条件或者某两种条件，使得政治参与意愿产生。然而，回归分析方法的先验假设便是自变量具有独立性，因此无法检验变量的组态效应。定性比较分

析方法可以通过组态分析，实现对相互依赖的多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分析^[39]。因此，接下来通过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来揭示这3个自变量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讨论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三、社会资本：政治参与的核心条件

（一）数据获取

为了获取更为丰富的一手资料，更加有力地证明研究假设，基于前期的调查和定量分析结果，课题组于2020年9月至10月和2021年7月至8月开展第二阶段的数据收集。

表3 访谈的企业家特征

编号	企业家	行业	访谈时间	资料编号
01	MYX	文化、体育、娱乐业	202107	01202107MYX
			202010	01202010MYX
02	WZR	农业	202107	02202107WZR
03	YBD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02009	03202009YBD
04	CF	文化、体育、娱乐业	202009	04202009CF
			202107	04202107CF
05	LJL	文化、体育、娱乐业	202009	05202009LJL
06	ZL	住宿、餐饮业	202010	06202010ZL
07	ZQQ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02010	07202010ZQQ
08	ZDL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02010	08202010ZDL
09	SJF	技术服务业	202010	09202010SJF
10	ZR	技术服务业	202010	10202010ZR
			202107	10202107ZR
11	CG	房地产业	202010	11202010CG
12	CSH	医药业	202010	12202010CSH
13	WYB	文化、体育、娱乐业	202010	13202010WYB
14	WJ	文化、体育、娱乐业	202010	14202010WJ
15	LYL	文化、体育、娱乐业	202010	15202010LYL
16	JMT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02010	16202010JMT
17	ZY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02009	17202009ZY

在这一阶段，根据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案例选择应具有足够多样性的原则^[40]，对陕西省 17 位民营企业进行深度访谈，访谈的问题覆盖了问卷调查中关于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和社会资本的问题，让企业家阐释他们的参政意愿或者参政经历，最终形成了 17 个关于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案例。整理出超过 10 万字的访谈稿，为研究的定性分析奠定了翔实的原始资料基础。访谈对象的特征如表 3 所示。

(二) 变量操作化

因为这一阶段的研究样本量较小，故采取拉金等提出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使用二阶扎根编码技术思想提取条件和结果变量构建真值表。该阶段的变量是从企业家的访谈内容中获取，因此具体变量的操作化与第一阶段的显变量表达略有不同，但意思表示几乎一致，保证了前后研究的一致性。具体的变量操作化如表 4 所示。

表 4 变量真值表

变量	操作化定义	赋值依据	赋值
政治身份	是否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工商联成员等正式政治身份。	有 无	1 0
亲社会动机	政企互动是否(1)为了企业家说话；(2)是否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3)是否为了社会经济发展尽力。以上三点满足其一，就算亲社会动机较强；无上述三点，或只存在政企互动是为了寻求政府对本企业的庇护或帮助的意思表示。	强 弱	1 0
社会资本	主观上感知自己是否与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建立了稳定的非正式关系。	有 无	1 0
政治参与意愿	有多大程度愿意进行参政议政或与政府合作。	强 弱	1 0

(三) 结果分析

1. 必要性分析

必要性分析是进行定性比较分析的先行步骤。在定性比较分析中，单个变量是否具有必要性，主要取决于一致性的高低，一般认为一致性大于 0.9 是判断必要条件标准^[41]。如表 5 所示，本研究中亲社会动机一致性超过 0.9 是必要性条件，说明当企业具备较强亲社会动机时更倾向于参政议政，同政府进行合作。而政治身份、社会

资本的一致性均低于 0.8，表明其单独对结果的解释性相对较低。

表 5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政治身份	0.363636	1.000000
亲社会动机	0.909091	0.714286
社会资本	0.727273	1.000000

2. 组态分析

接下来，尝试对各条件变量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借助杜运周、贾良定的方法^[42]，将案例数量的域值设置为 1，PRI 一致性临界值设置为 0.75，即高于 0.75 的编码为“1”，低于 0.75 的编码为“0”。将亲社会动机作为必要性条件，进行标准化分析。为方便展示，本研究采用 FISS 提供的图示法呈现结果形式。在本研究的条件组态分析中，解的覆盖率达到 0.73，说明生成的条件组态能够解释 73%

的案例，表明上述条件组态对政企互动参与意愿具备较好的解释力，并形成两种条件组态。

根据逻辑余项的有无以及“容易”与“困难”，可将组态分析的结果分为简约解、中间解、复杂解三种形式。一般使用中间解和简约解进行案例分析和理论提炼^[43]。在 QCA 分析中，那些既在中间解又在简约解出现的条件作为核心条件，而只在中间解出现的条件作为边缘条件或辅助条件^[44]。因此，选择条件组态的中间解呈现研究结

果，其中社会资本是核心变量。如表6所示，条件组态1的原始覆盖率为0.36，但唯一覆盖率为0.09，只能解释9%的案例；而条件组态2的原始覆盖率为0.64，且唯一覆盖率达0.36，说明条件组态2可以解释大约36%的案例。解的覆盖率为0.73，表示这两种条件组态可以解释73%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案例。组态一与组态二同时具备核心条件社会资本，且政治身份成为可有可无的条件，两者就可以整合为同一路径。换言之，当民营企业具备社会资本这一核心条件，无论是否具有较强亲社会动机，或是否具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正式政治身份，都会有更高的政治参与概率。这与之前的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形成呼应，都说明了社会资本在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中的重要作用。

表6 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的条件组态

条件变量	条件组态	
	1	2
政治身份	⊗	
亲社会动机		●
社会资本	●	●
一致性	1.00	1.00
原始覆盖率	0.36	0.64
唯一覆盖率	0.09	0.36
解的一致性	1.00	
解的覆盖率	0.73	

注：●表示核心条件，即在简约解和中间解共同出现的变量；⊗、●表示边缘变量，即只在中间解出现。

四、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发生逻辑

当考察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对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的预测作用时，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都能对政治参与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而社会资本是影响政治参与意愿的核心条件。通过访谈得知，在拥有政治身份时，无论亲社会动机水平和社会资本情况是强是弱，企业家都会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政治参与过程。对于那些已经具备政治身份的企业家而言，

政治身份是实现政治参与和政企合作一大利器，能够为企业家带来更多的收益。例如，作为政协委员的ZR有许多与政府官员接触的机会，在一次调研中，她向所在的Y区行政审批局提出，希望与政府合作建设政务网上服务中心。鉴于ZR提出的建议对该区改善行政审批服务有重要参考价值，又由于ZR本身从事互联网科技行业，具有相应的技术，加上这项决策又是出于她的想法，她就很顺利地拿到这个项目（访谈资料：10202107ZR）。而没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例如ZL、SJF、JMT等，即使愿意进行政治参与，也都没有参与渠道（访谈资料：06202010ZL、09202010SJF、16202010JMT）。

然而，拥有政治身份只是为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参与路径，并不意味着企业家就非常愿意进行政治参与，而亲社会动机才是政治参与的内生动力。例如，访谈对象WZR也是政协委员，因为她的企业为许多失地农民提供了工作岗位，她非常关注乡村振兴。2018年，她建议区政府为农民提供购买现代化农业设备的补助。与此类似的还有MYX，她提出添加维护城市绿化带现代化设备的建议，旨在为城市建设出谋划策。然而，亲社会动机作为政治参与的驱动力会因为外在的负面因素而变弱。挫折理论认为，当个体遭遇挫折时，会采取消极对待的态度来建立自我的防御机制，保护自己免受过分低沉情绪^[45]。由于提案审核程序漫长、当地政府不够重视等一系列因素，WZR和MYX的大部分提案都没有得到采纳，于是他们认为政治参与并不能实现他们帮助社会成员的愿望，渐渐不愿意进行政治参与（访谈资料：02202107WZR、01202010MYX）。

从两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可知，让企业家产生政治参与意愿的核心条件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企业家带来了在市场交易中得不到的稀缺资源，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外向激励，这种外在激励超越了政治身份和亲社会动机的作用。企业家本质仍然是逐利的，在访谈中，愿意尽到

社会责任的 MYX 表示,“进行政治参与不如专心致志发展企业带来的收益更大”(访谈资料:01202010MYX)。对于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来说,政治身份本身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显著的收益,为他们带来潜在获益的是政治身份关联的社会资本,即通过与政府官员稳定的非正式关系而获利。在访谈中,作为政协委员的 ZR 就能直接与当地行政审批局对话而开展政企合作(访谈资料:10202107ZR),而不是政协委员的 CF,拿着建设城市名片的项目,在寻求与政府合作时处处碰壁(访谈资料:04202107CF)。对于那些没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来说,社会资本就成了预测他们政治参与意愿力度的最强因素。在具有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非常显著^[46]。即使没有政治身份,那些具备亲社会动机的企业家渴望通过自己与政府官员的私人交往获得政治参与的机会和信息。同样以 CF 为例,尽管走正式途径屡屡碰壁,但他通过熟人把自己的想法传达到了政府内部。CF 表示,通过非正式途径可以更快地将自己的想法传达到领导层,这样有利于提高政治参与的成功率(访谈资料:04202107CF)。这可以提升企业家的自我效能感,进一步促使他们愿意去进行政治参与。

从另一方面看,社会资本代表的外在激励比内在的亲社会动机更能持久促进企业家产生政治参与的意愿。从地方发展经济的模式来看,企业家(特别是拥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家)背后都站着关心市场竞争结果的官员,而企业家会从这些官员处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47]。因此,构建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也是企业家政治策略的重要部分。

五、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构建出“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社会资本”三位一体的企业家政企互动行为与意愿影响理论模型;同时,利用问卷调查和清晰集定性比较方法两种方式,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印证与检验,形成了文献、问卷、

访谈的三角互证关系。

在数据模型中,当只考虑单一变量的影响时,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只考虑政治身份和亲社会动机时,这两者对政治参与意愿正向影响显著。然而,将社会资本纳入模型后,无论考虑亲社会动机与否,政治身份的影响就不显著了,但社会资本的影响始终显著。考虑到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三者可能存在复杂的联系机制,本研究进一步通过清晰集定性比较方法分析这三者的不同条件组合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最终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是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核心条件,社会资本越强的企业家,越愿意进行政治参与。政治身份与亲社会动机是企业家愿意进行政治参与的辅助条件。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与回归分析的结果相互呼应,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离不开政企间的双向互动,因此,需要提高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意愿,让他们积极融入政治生活。基于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和社会资本对政治意愿的正向影响,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确保现有参政渠道的完整、合法和有效。对原有参政形式进行调整,建设多元参政渠道,扩大参政范围,促进参与制度的落实。例如,改变传统线下会议模式,利用新媒体或互联网等形式开展论证会、听证会、座谈会,采用多种形式扩大意见征询面。第二,在立法层面降低企业家参政议政的门槛,提高小微企业代表参会比例,增加其参政机会,扩大参政范围。鼓励年轻企业家到政府经济部门挂职锻炼,推动企业家到省工商联挂职、担任特约监察员等,促进各企业在互帮互助、维护群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参政议政。第三,加强对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企业家也需要提升自身参政议政的素质和法律意识。积极了解本群体可以参政议政的各种渠道,踊跃加入各种商会或行业协会,并积极参与它们举办的活动。加强企业党建工作,利用党的领导

赋能政治参与。合理运用政策和法律武器，面对不公正的对待，能够通过合法渠道积极维权。同时，坚决杜绝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特权的想法和图谋。

参考文献：

- [1][16] 黄冬娅. 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类型建构[J]. 社会学研究, 2013(5): 173、178.
- [2] 吴晓林. 从政治“排斥”到“积极整合”：新时期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整合政策的变迁[J]. 探索, 2012(4): 36.
- [3] Faccio 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1): 369.
- [4][17] 李娉, 杨宏山. 政企互动与规制重建：企业家如何推进政策创新？——基于深圳改革经验的实证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3): 52、53.
- [5] Li S, Song X, Wu H. Political connectio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China: A strategic-polit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2): 399.
- [6][9][37] 梁建, 陈爽英, 盖庆恩. 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治理结构与慈善捐赠[J]. 管理世界, 2010(7): 110、112、116.
- [7] 郑春勇, 朱永莉. 论政企合作型技术治理及其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应用——基于中国实践的一个框架性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1(2): 58.
- [8][23] 张建君. 嵌入的自主性：中国著名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J]. 经济管理, 2012(5): 39、39.
- [10] Feng X, Johansson A C, Zhang T. Mixing business with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entrepreneurs in China[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5(59): 220–235.
- [11] 董明. 转型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民营企业政治行为[J]. 学习与探索, 2012(2): 54.
- [12][47] 周黎安. “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J]. 社会, 2018(2): 10、11.
- [13] 聂辉华. 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J]. 学术月刊, 2020(6): 47–48.
- [14] 陈晨, 张广胜. 国家创新型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影响效应评估——政策动态过程与政企互动视角[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11): 126–135.
- [15] 阳春花, 庞绍堂. 民营企业嵌入式政治参与的模式与策略：基于亲清政商关系的视域[J]. 江海学刊, 2020(6): 243.
- [18] 辛杰, 房林林. 企业家政治参与动机的文化价值观前因[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5(5): 30.
- [19][31] 姚丽霞, 万斌. 民营企业政治参与的客观特征及嬗变因果机制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14(9): 170、171.
- [20] 马丽波, 路文静. 民营企业行为与政府政策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4(1): 108–109.
- [21] 王永香, 李忠鹏. 亲清政商关系引领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行为研究——基于纳什均衡思维框架[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1(4): 36–44.
- [22] 张伟. 政治市场：民商阶层行为逻辑的新视角[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5(6): 168.
- [24] 刘志永. 转型期地区创新系统中的“双主体”——基于政府与企业家的演化博弈[J]. 经济问题, 2020(5): 113–122.
- [25] 张绘. 混合研究方法的形成、研究设计与应用价值——对“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的探析[J]. 复旦教育论坛, 2012(5): 52–55.
- [26] Oyserman D, Destin M. Identity-based motiv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J].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010(7): 1001–1043.
- [27] 田志龙, 李连翔, 陈丽玲, 等. 企业政治资本是什么，如何构建和如何利用[J]. 清华管理评论, 2021(Z2): 60.
- [28][29] Preeti Tiwari, Anil K. Bhat, Jyoti Tikoria. Mediating Role of Prosocial Motivation in Predicting Socia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J]. *Journa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2020(1): 5、6.

- [30] McMullen J S, Bergman JR B J.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development paradox of prosocial motivation: A cautionary tale[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7(3): 244-245.
- [32] 边燕杰, 丘海雄. 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2): 88.
- [33] 惠朝旭. 企业家社会资本: 基于经济社会学基础上的解释范式[J]. 理论与改革, 2004(3): 118.
- [34][35] 罗党论, 唐清泉. 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 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 2009(7): 90、90.
- [36] 胡旭阳.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J]. 管理世界, 2006(5): 110-111.
- [38] 单翔. 家国情怀: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信仰基因[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1): 172-173.
- [39][42][45]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6): 156、160、166.
- [40][41] 王英伟. 权威应援、资源整合与外压中和: 邻避抗争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基于(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2): 32、33.
- [43] 武晗, 王国华. 注意力、模糊性与决策风险: 焦点事件何以在回应型议程设置中失灵? ——基于 40 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1(1): 55-65+17.
- [44] 廖福崇. “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了营商环境吗? ——基于 31 省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电子政务, 2020(12): 104.
- [46] 卢盛忠. 西方心理学的挫折理论[J]. 外国心理学, 1981(3): 31.
- [47] 翟学伟. 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本土的概念及其模式[J]. 社会学研究, 1993(4): 74-83.

责任编辑: 蒋建忠

不同研发类型组态效应对高校科技创新绩效影响

——基于31个省份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葛媛媛

摘要:提升高校科技创新绩效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以我国31个省份地区为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QCA),对我国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进行研究,得出3种组态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人力”组态、“基础研究经费+试验发展人力”组态、“人力资本+基础研究经费”组态,其中人力资本和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是更为重要的因素。研究为高校科技创新绩效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高校科技创新;研发活动;组态思维;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5-00071-08

高校拥有数量充足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建设学科等创新资源,是我国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高校产出大量的科研成果,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高低标志着高质量科技供给的能力与水平,事关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因而,高校科技创新绩效问题愈发引起政府及学界的关注。

一、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一)文献回顾

1. 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研究

已有研究从高校科技创新行为的各阶段绩效

入手,或针对高校科技创新活动实现和转化几个阶段的差别,研究2008年至2016年我国高校科技创新的实现与转化效率^[1];或立足于高校科技创新产出的全链条,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各因素,分析高校科技创新研究与开发阶段及成果转化阶段的绩效^[2];或基于知识创新、科研创新和收益三阶段,运用超效率SBM模型,研究2005年至2017年中国29个省高校科技创新效率^[3]。也有部分学者借鉴发达国家科研评价指标,评价区域高校科技创新绩效^{[4][5]}。还有学者从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如产学合作^[6]、

收稿日期:2022-10-08

作者简介:葛媛媛,盐城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成效评估与风险防范研究”(22AGL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创新团队^[7]、创新人才和科技投入^[8]等方面进行探索。

2. 研发类型活动研究

高校科研活动和产出根据研究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种类型。基础研究的特点是探索未知,成果主要是科学论文^[9]。高校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多少与人员投入的规模,都可能影响高校科技创新的绩效。有研究者基于 2010 年至 2017 年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了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规模对高校基础研究科研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关系^[10]。高校基础研究支持不足是我国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位置下滑的另一个原因^[11]。高校应用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导,推动了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其主要成果形式是专利。试验发展是利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成果得到技术改进等^[12],主要成果为发明新材料、新产品,或者优化产品、服务等,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的融通愈来愈得到重视,因为三者的融通强化了政产学研的合作,促进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

虽然上述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有值得更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一是已有研究主要从科技创新活动的阶段性或常规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而缺乏从研发活动类型的视角分析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然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对高校科技创新在不同阶段、不同方式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深化高等教育改革,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在结构要素、组织模式、成果转化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要变革,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在高校科技创新绩效形成方面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亟待探究。二是已有研究主要是采用传统研究范式中定性与定量的相关方法,来研究单个变量的“净效应”^[13],从而分析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但是,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提升是复杂的多项因果关系联动形成的结果。现有研究的局限在于各因素(条件)之间的互动与联系没有被揭示出来。例如,因素之间的互动可能会产生 $1+1 > 2$ 的互补作用,还是可能会产生 $1+1 < 2$ 的替代情况^[14]? 多个影响因素中,哪个因素或哪几个因素的共同存在是核心因素,对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提升有何必要存在的意义? 这些问题亟待破解。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进行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研究,该方法被认为是探索多因素“联合效应”和“互动关系”的有效方法^[15],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学科。本研究从高校科技创新研发经费入手,通过 31 个省份高校经费资源和人力资源配置的比较研究,探究不同研发类型组态效应对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结合案例分析,形成可复制的经典路径,为提高高校科技创新绩效,为政府管理部门和高校提供决策参考。

(二) 模型构建

本研究基于研究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影响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框架,并揭示不同研发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论模型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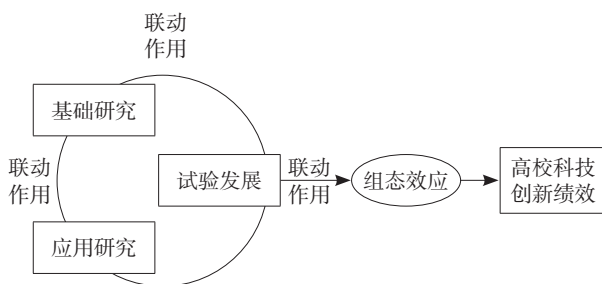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模型框架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 fsQCA 方法探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影响高校科技创新绩效影响的因果机制。一是拓宽了研究视角,fsQCA 方法基于组态视角,取代原来采用“自变量—因变量”

之间单因素思维的因果逻辑,二元关系很难清晰地阐述三个以上变量之间的交互、联动作用,因此对多重因素组态效应的研究结果更具有普适性和全面性。二是新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是组态思维,是一种条件集合和结果集合之间集合关系的因果推断,是对传统主流研究中“净效应”的补充,能克服传统研究范式中定性与定量这两种方法的缺点,将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适用于非对称、并发等复杂因果关系形成的社会问题的分析^[16]。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20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17]。该报告涵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前因条件变量,以及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结果变量,把上述四个变量的统计资料进行匹配后,将数据完整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案例。

(三) 变量测量与校准

1. 结果变量

高校科技创新绩效涉及基础研究领域、应用研究领域和试验发展领域三个方面,主要包括科技专著、发表论文、专利授权和技术转让收入等。本研究中的结果变量,高校科技创新绩效(P)由四个二级指标共同所得,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高校科技著作数量、发表论文数量、专利授权数量和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进行指标降维,运用SPSS软件运算出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综合得分。

2. 前因条件

每个条件变量指标下设二级指标,各二级指标采用从《2020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获得的有关数据来测度。具体测量如下。

基础研究。分为人力资本和科研经费利用率两方面。其中,人力资本使用当年投入人员数量表示,科研经费利用率使用当年支出经费与当年拨入经费的比来表示。

应用研究。分为人力资本和科研经费利用率

两方面。其中,人力资本使用当年投入人员数量表示,科研经费利用率使用当年支出经费与当年拨入经费的比来表示。

试验发展。分为人力资本和科研经费利用率两方面。其中,人力资本使用当年投入人员数量表示,科研经费利用率使用当年支出经费与当年拨入经费的比来表示。

3. 变量校准

本研究在已有理论和经验知识的基础上,采用直接校准法把6个条件变量与1个结果变量(高校科技创新绩效)校准为模糊集^[18]。基础研究的人力资本、科研经费利用率,应用研究的人力资本、科研经费利用率,试验发展的人力资本、科研经费利用率,以及高校科技创新绩效完全隶属的校准标准为0.95,交叉点的校准标准为0.5,完全不隶属的校准标准为0.05。结果与各条件的指标描述和校准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指标描述与校准

变量	指标描述	变量标签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创新绩效	科技著作	P	3.874	-0.600	-1.938
	发表论文				
	专利授权				
	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				
基础研究	人力资本	A1	19838.400	4552	187.200
	科研经费利用率	A2	1.292	0.770	0.568
应用研究	人力资本	B1	19919.600	4830	209.400
	科研经费利用率	B2	1.056	0.800	0.482
试验发展	人力资本	C1	4297.800	926	24.400
	科研经费利用率	C2	1.058	0.770	0.566

三、分析结果

(一) 各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对条件组态进行分析之前,必须对各个条件的必要性,逐一单独检验。因为必要条件不会在 fsQCA 的简约解中呈现,但该条件又会显著影响结果产生。本研究首先检验单一条件是否是构成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一致性是衡量必要条件的重要标准,一致性指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一致程度。一般来说,当一致性大于 0.9 时,则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19]。使用 fsQCA 3.0 软件分析的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检验结果见表 2。从中可以看出,所有条件的一致性水平都小于 0.9。所以,不存在影响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

表 2 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高校科技创新绩效	
	一致性	覆盖度
人力资本 A1	0.887	0.880
科研经费利用率 A2	0.726	0.751
人力资本 B1	0.875	0.928
科研经费利用率 B2	0.685	0.663
人力资本 C1	0.837	0.893
科研经费利用率 C2	0.728	0.698

(二)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 fsQCA 3.0 软件分析影响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前因条件组态,这些不同的组态表示实现同一结果(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不同条件组合。组态分析试图揭示的是多个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引致结果产生的充分性,一般使用一致性来衡量组态的充分性。研究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一致性阈值,有 0.75^[20]、0.8^[21]等。在频数阈值的确定上,需要根据样本规模而定^[22],对

于中小样本,频数阈值为 1 即可;对于大样本,频数阈值则大于 1。具体到本研究,综合考虑后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75,将 PRI (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 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75,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 1。

现有研究关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条件变量与高校科技创新绩效之间尚未达成一致结论,所以在进行反事实分析时,假设单个前因条件出现与否均可贡献高校科技创新绩效。在进行标准化分析时,条件对结果关系的问题时选择了“存在或缺失”(Present or Absent)。fsQCA 3.0 会得出三种复杂程度不同的解: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与已有研究一致,本研究中间解的同时,辅之简约解。如表 3 所示,六条组态是(路径: S1a、S1b、S1c、S2a、S2b、S3)影响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充分条件组合。对比中间解与简约解的嵌套关系,确定每个解的核心条件:同时在中间解、简约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该解的核心条件,仅仅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该解的辅助条件^[23]。将具有相同的核心条件的组态(S1a, S1b 和 S1c)及(S2a 和 S2b)各归为一类,(S3)单独归为一类,因此可简化为 3 种核心组态类型。无论是单个解(组态)还是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要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 0.75,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为 0.962,总体解的覆盖度为 0.758。

影响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组态,依据核心条件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1. 组态 1: 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人力资本为核心(S1 型)

组态 1 中,实现我国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总体特征是以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的人力资本为核心条件存在。路径 S1a (A1* B1*~b2* c1)、路径 S1b (A1* a2*B1*~b2* c2) 和路径 S1c (A1* a2*B1*~b2* ~c1*~c2) 具有相同的核心条件:基础研究人力资本和应用研究人力资本,表明基础研究人力资本和应用研究人力资本是高校科技创新绩效产生的重要条件,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因为

辅助条件不同而出现了3条不同路径。

路径 S1a 中,以试验发展人力资本作为辅助条件,说明基础研究人力和应用研究人力能有效产生高校创新绩效,也表明试验发展人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力不足的影响。路径 S1b 中,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试验发展科研经费利用率共同发挥了辅助性作用,表明基础研究人力和应用研究人力作为核心条件产生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的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也能发挥辅助性作用。路径 S1c 中,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应用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共同发挥了辅助性作用。表明基础研究人力和应用研究人力作为核心条件产生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也能发挥辅助性作用。综合不同路径分析发现,基础研究是更为重要的核心条件,因为即使作为辅助条件,基础研究的人力或科研经费出现程度更高。

2. 组态 2: 以基础研究经费利用率和试验发展人力资本为核心 (S2 型)

路径 S2a ($\sim a1 * A2 * b2 * C1 * c2$) 和路径 S2b ($A2 * b1 * b2 * C1 * c2$) 具有相同的核心条件: 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和试验发展人力资本发挥了核心作用,在辅助条件上有所差异。

路径 S2a 中,在以基础研究经费利用率和试验发展人力资本发挥核心作用的情况下,应用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试验发展科研经费利用率发挥了辅助性作用。路径 S2b 中,应用研究人力资本、应用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试验发展科研经费利用率发挥了辅助性作用。

3. 组态 3: 以人力资本和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为核心 (S3 型)

路径 S3 ($A1 * A2 * B1 * C1 * c2$), 具有基础研究人力资本、应用研究人力资本、试验发展人力资本及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 4 个核心条件, 试验发展科研经费利用率为辅助性条件, 该组态的一致性最高为 0.984, 唯一覆盖率为第二高。

表 3 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组态分析

变量	组态路径					
	S1a	S1b	S1c	S2a	S2b	S3
基础研究人力资本 A1	●	●	●	⊗		●
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 A2		●	●	●	●	●
应用研究人力资本 B1	●	●	●		●	●
应用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 B2	⊗	⊗	●	●	●	
试验发展人力资本 C1	●		⊗	●	●	●
试验发展科研经费利用率 C2		●	⊗	●	●	●
一致性	0.957	0.982	0.977	0.970	0.983	0.984
覆盖度	0.588	0.484	0.374	0.384	0.502	0.521
总体一致性	0.962					
总体覆盖度	0.758					

注: ●表示该条件出现,其中大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圈表示边缘条件;⊗表示该条件不出现;空白表示该条件是否出现并不影响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第一,从总体上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因素都不能单独作为影响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说明任何单一因素既不能构成制约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成为引发高校科技创新绩效提升的充分条件,高校科技创新绩效提升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从单条组态路径看,高校科技创新绩效存在 6 条提升路径,可以简化为 3 种核心组态路径。具体可以归纳为: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人力资本为核心、以基础研究经费利用率和试

验发展人力资本为核心、以人力资本和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为核心。通过对 3 种核心组态路径的对比发现：一是人力资本存在于 3 种核心组态路径中，对提高高校科技创新绩效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利用率存在于 2 种核心组态中，对提高高校科技创新绩效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从同一组态类型上看，路径 S1a、路径 S1b、路径 S1c 有相同的核心条件，路径 S1a 有 2 个辅助条件，覆盖率为 0.588，路径 S1b 有 3 个辅助条件，覆盖率为 0.484，路径 S1c 有 4 个辅助条件，覆盖率为 0.374，说明我国不同高校科技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存在明显的差异化，由于各高校自身的科技资源禀赋，以及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研究中投入的人力和财力的不同，高校科技创新绩效影响条件的差异导致了提高绩效路径的差异化。

（二）理论贡献

相较于其他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相关研究而言，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一是将高校科技创新绩效问题研究从关注单一技术视角转向多因素联动作用的整体视角。本研究从“组态视角”出发，基于不同研发活动类型“人力资本 - 科研经费”理论框架，分析了不同研发类型的人力资本和科研经费使用效率等多重条件在推动高校提升科技创新绩效上的并发协同效应与联动匹配模式，解释了高校提升科技创新绩效背后的“因果复杂性”。二是将 fsQCA 方法引入高校科技创新绩效问题的研究中，这不仅是研究方法的丰富，更为高校提升创新绩效的后续决策形成奠定了基础。本研究表明不同地区高校科技创新绩效提升的驱动路径存在显著差异，这进一步阐释了造成高校科技创新绩效水平异质性的非对称因果关系。

（三）对策建议

1. 加强高校基础研究，促进不同研发活动融通

基础研究被喻为技术创新的总开关，是高校

科技创新绩效提升的基础。完善高校基础研究体系，构筑完善的创新生态链条，促进不同研发活动联动，提升重大成果原创性，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高校基础研究体系，促进原始创新。夯实基础，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制定出台相关政策，完善国家实验室建设机制，加快国家实验室建设，发挥其“领头羊”作用；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学前沿的布局；促进完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行业所建设的实验室布局和运行机制，强化特色，提升效率，从而整体上形成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级实验室（行业企业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平台体系。促进学科交叉和汇聚，资源整合与优化，增强学科集聚能力，建设高水平学科。依托高水平学科集群，组织实施重大基础科研专项，鼓励 0 到 1 的创新。

完善创新生态链条，促进不同研发活动联动。在重视基础研究之上，构建“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试验开发 + 科技金融”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支持高校与龙头企业在前沿交叉、优势特色领域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原始创新与产业化落地；支持高校与骨干企业在市场需要、前景明显的领域开展重点产学研项目合作，通过深化政产学研合作，支撑地方主导产业转型升级。支持高校与中小企业在需求明确、操作性强的领域开展微观创新，促进高校与千家万户的中小企业广泛合作，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益。

2. 创新人才引进机制，提升高校科研队伍质量

在科研人才引进方面，高校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学科建设需要，充分利用国家和省市政策叠加的机遇，充分利用国家、省市人才工程计划，引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还可以抢抓海外人才回流的历史性机遇，鼓励与海外高校院所共建国际人才“飞地”等，推动高校在更大范围积极配置全球创新资源，探索打造海外人才离岸创新

基地。

在科研人才培养方面，要大力培养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推动创新与创业的融合。因此，建议深化高校与产业部门人才双向交流制度，进一步创新实施“挂职科技镇长团”“担任科技副总”“聘任产业教授”和研究生培养“双导师制”等方式，建立“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的技术创新合作渠道和成果共享机制，提升高校科研人才队伍建设质量，强化科技创新链对接产业链，共同解决重大科技创新问题，提升高校科技创新绩效。

3. 创新人才激励机制，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

建立健全以创新贡献为导向的高校科技人才激励评价体系。一方面，完善分类激励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完善激励评价手段。改变追求“短、平、快”、急功近利的评价导向行为，针对基础研究人才、青年人才的科研评价考核，适当延长考核周期，鼓励其甘于坐冷板凳，潜心研究。

构建切实增强高校科研人员获得感的收益分配机制。加快实施高校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试点，激发科研人才释放内在创新潜能，增强科研人员获得感。进一步提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比例、科技奖励额度，推动科研人员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探索实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赛马”、定向委托等新模式，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

4. 提升基础研究经费利用效率，促进科技创新绩效提升

在加大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同时，优化基础科研经费配置结构，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国家在基础研究类科研项目中实行经费包干制的政策，将经费全部用于本项目的研究工作中，并承担绩效的支出，对项目研究中的创新绩效团队和个人给予倾斜，推动科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胜会, 朱绍棠. 从实现到转化: 高校科技创新演变及效率[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6): 53-62.
- [2] 何声升. 高校科技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分位研究——创新价值链理论视角[J]. 高校教育管理, 2020(5): 104-114.
- [3] 初旭新, 马昱.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高校科技创新效率评价[J]. 科技管理研究, 2020(22): 119-123.
- [4] 黄小平, 刘光华, 刘小强. “双一流”背景下区域高校系统科技创新能力: 绩效评价与提升路径[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 93-102.
- [5] 张家峰, 李佳楠, 陈红喜, 等. 长三角高校科研创新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DEA-Malmquist-Tobit 模型[J]. 科技管理研究, 2020(9): 80-87.
- [6] 王晓红, 张少鹏, 张奔. 产学研合作对高校创新绩效的空间计量研究——基于组织层次和省域跨层次的双重视角[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1(1): 125-137.
- [7] 徐礼平, 李林英. 高校重大科研项目团队心理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J]. 高校教育管理, 2019(1): 55-64.
- [8] 汪晓梦. “十二五”期间西南高校科技创新绩效评估与比较[J]. 科学管理研究, 2018(5): 66-69.
- [9] 郑雁军. 基础研究概念的演变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J]. 中国科学基金, 2019(5): 515-519.
- [10] 陈骏. 立足高地攀登高峰 开启新时代高校基础研究新征程[J]. 中国高等教育, 2018(6): 17-19.
- [11] 孙玉涛, 柳玉梅, 陈灵芝, 等. 我国高校研发经费: 规模、结构及建议[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4): 60-67.
- [12] 张宝生, 王天琳, 王晓红. 政府科技经费投入、研发规模与高校基础研究科研产出的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 2021(4): 55-63+74.
- [13][23]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6): 155-167.
- [14] 张明, 陈伟宏, 蓝海林. 中国企业“凭什么”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基于 94 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4): 117-135.

(下转第 80 页)

发挥红色影视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路径探析

褚圆亮 郭玲霞

摘要:红色影视作品作为传播红色文化的有效载体,具有导向引领、激励上进、理论宣传的功能。本文针对红色影视作品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中遇到的困境,探讨通过把控作品质量、加强针对性、创新方式方法,进一步发挥红色影视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关键词:红色文化;影视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5-00078-03

红色影视作品是以电影、电视剧等来表现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历史文化、历史事件,向人们传播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红色影视作品能引导受众对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获得正确的认识,从而激发受众的爱国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红色影视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 导向引领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担当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红色影视作品中体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正确引导受众向国家、社会及个人所预期的正确方向发展,具有导向引领功能。

通过传播红色影视作品,宣传红色文化,能够帮助受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使受众坚定理想信念。红色影视作品中传递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引领他们的理想追求,培育他们勇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 激励上进功能

激励上进功能是指,“利用生活中的物质实体和精神文化产品所隐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激发主体促进社会进步、促进自我发展的动机和热情,使其积极主动参与到个体及社会的精神文化构建中”^[2]。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红色影视作品中的精神力量能够促进受众的思想转化。例如,电影《长津湖》通过激烈的战争场景,展现了人民志愿军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精神,战

收稿日期:2022-06-07

作者简介:褚圆亮,中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郭玲霞,中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高等教育。

士们不顾一切都要完成任务的决心和毅力，激励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为了理想信念不断前进。

（三）理论宣传功能

红色影视作品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软性的传播方式，这样的方式能使主流文化一点一滴渗透到观众的思想行为中，带领观众感知并认同红色影视作品所传导的精神，从而为社会主义发展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例如，电视剧《功勋》主要讲述了国家首批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人生经历，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英勇无畏献身祖国的崇高精神，不仅让受众了解这些英雄的一生，而且让他们看到了推动祖国建设发展所需的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毅力。

二、发挥红色影视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面临的困境

（一）部分红色影视作品的创作形式与实际不符

红色影视作品主要以历史中的真实事件为创作题材，大多数作品都可以找到原型，但也有一些影视创作者一味追求娱乐性，违背历史，导致某些“神剧”的出现。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影视剧不仅会让受众忽略战争的残酷性，误导受众对党史的认识和理解，甚至容易歪曲受众的价值观。

（二）部分红色影视作品的教育功能不明确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红色影视作品日益受到观众的喜爱，其特有的政治性、历史性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然而，有些影视创作者过度依赖偶像明星，导致红色影视作品与原本传递红色文化精神的目的相背离；有的红色影视作品加入过多的现代元素，服装、道具、场景、特效等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有的甚至将网络用语用于台词，把现代广告植入剧情，不仅弱化了红色影视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也降低了红色影视作品的影响力。

（三）部分红色影视作品的融合方式不突出
相比讲授式教学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充

分运用红色影视作品，通过其特有的视觉体验和情感刺激，更容易引发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目的。目前，尽管不少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把红色影视作品作为教学素材，但是效果并不显著。部分思政课老师选取红色影视作品作为课堂素材时缺乏针对性、时效性，甚至出现影片的娱乐性大于教育性的情况，导致学生在观影过程中分不清主次，影响了红色影视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此外，红色影视作品给学生带来的是较为浅表的感官刺激，如果缺乏后续深入的分析讲解帮助学生加深理解，红色精神的传递必然缺乏可持续性，从而影响思政课的授课效果。

三、提高红色影视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有效路径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红色影视作品时把控作品质量

红色影视作品的质量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优秀的红色影视作品的创作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一定要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不仅要有迹可循，更要有史实可遵。首先，要深入挖掘红色历史文化内涵，创新艺术表现形式。好的影视作品不仅能够增强观众对历史事件的了解和认识，而且通过艺术表达形式创新，在还原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又与现代生活相贴近。其次，要提高红色影视作品的创作者对剧本质量的把控能力。剧本、创作者、演员这三个因素是红色影视作品能不能达到符合人民观影需求的关键。优秀创作者普遍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总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创作符合主流文化的作品，对剧本的把控和理解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样的创作者创作出的作品更容易深入人心。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红色影视作品时加强针对性

影视创作者在创作之初一定要明确作品的红色属性。影视创作者要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们在

革命战争年代走向胜利，一步一步取得今天辉煌成就的历史再现至当代受众的面前，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理清红色影视文化与大众娱乐的关系，精准把控作品想要传达的红色内涵。影视创作队伍要针对不同受众群体进行创作，并且进行精准传播。在影视创作中融入现代元素时要找好平衡点，让人们感受到爱国主义已成为人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思政教育者在充分了解授课对象的同时，也要精准把握不同影视作品的受众群体，有针对性地选择最适合的影视作品。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红色影视作品时创新方式方法

红色影视作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间应当相辅相成，因此，在将红色影视作品融入课堂时一定要提前做好教学准备工作。在思政课教学中融入的影视作品必须根据教材内容确定，通过加入的影视素材，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教材的理解，也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提升思想认识。此外，思政课堂需要加强师生互动。例如，在《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老师可以播放《功勋》中的相关片段，并组织学生参加小组讨论，可采用辩论、小组发言、学生表演等方式积极引导学生融入课堂。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网络的优势。如今，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网络，可以通过一些流量大的网络平台传播红色影视作品，如抖音、微博、微信短视频等。这些平台开放性、传播速度快，人们可以通过评论进行交流及沟通，分享心得体会，这种同类群体的及时沟通更容易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EB/OL].(2018-08-22).www.gov.c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
- [2] 常青伟. 思政教育环境渗透研究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 179.

责任编辑: 宋好

（上接第 77 页）

- [15][18][19]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51.
- [16] 陈钰芬, 黄娟, 王洪刊. 不同类型研发活动如何影响 TFP?——基于 2000—2010 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J]. 科学学研究, 2013(10): 1512-1521.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2020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61.
- [20] 唐鹏程, 杨树旺. 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模式研究: 基于

价值的判断标准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 (7): 109-126.

- [21] 程聪, 贾良定.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清晰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6(6): 113-121.
- [22] Schneider C Q, Wagemann C.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70.

责任编辑: 吉强